



北京大學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满川龟太郎的亚细亚主义

The Asianist Thoughts of Mitsukawa Kametarō around the WWI Period

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展開——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を中心に

姓名：汪国彰

学号：1700015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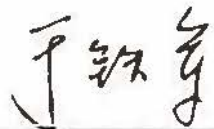
院系：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国际政治

指导教师：于铁军

二〇二一年六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满川龟太郎的亚细亚主义				
论文题目 (英文)	The Asianist Thoughts of Mitsukawa Kametarō around the WWI Period				
导师姓名	于铁军	职 称	教授	论文成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目的等评价)	<p>满川龟太郎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成立最早的右翼团体“犹存社”的创始人，同时也与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同为日本近现代“亚细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世人对他的关注度远不如后两者。直到最近，日本学术界有关满川龟太郎的研究才陆续出现。汪国彰同学的论文选取满川“亚细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展开研究，选题较为新颖，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p> <p>论文在对满川的回忆录和其本人撰写的大量时政论文进行仔细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将一战前后满川之“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发展分为“低落期”（1913-1915）、“过渡期”（1916-1918）和“成型期”（1919年及以后）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满川“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其成因结合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尽管满川始终是在“被欧美压迫”的意义上理解亚洲的一体性的，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满川反抗欧美压迫的“亚细亚主义”心情终究无法发展成为一种基于道义和对等关系的国际秩序新理念。</p> <p>总的来看，本文观点明确，思路清晰，结构合理，运用材料丰富，写作规范，文字流畅，是一篇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关于满川“亚细亚主义”中的国家理性本位还需要结合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论证。</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导师签名： </p>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论文作者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随意复制、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毕业论文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查重结果：1.2%

查重网站：<http://pku.co.cnki.net/Main.html?dp=pku&r=1622896816247>

论文作者签名：汪国影

日期：2021年6月6日

内容提要

亚细亚主义是犹存社创始人之一满川龟太郎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战前后则是满川亚细亚主义的发展与成型的关键时期。继青少年时代的亚细亚主义萌芽后,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一战前后经历了“低落期”(1913-1915)、“过渡期”(1916-1918)和“成型期”(1919年及以后)三个阶段。总体来说,他对亚洲的同情与关切不断增强;其“亚洲”视野从东亚扩展到印度、中亚,乃至包含犹太人和黑人等全体被压迫民族;他的亚洲政策提案从中国分割论转向了中日军事经济同盟论,在一战结束后发展为以中国革命与日本改造为前提的亚洲解放论。

冷彻的现实主义国家理性是满川龟太郎最突出的特质。尽管满川有着强烈的亚细亚主义心情,实际推动他在对外政策构想上回归亚洲的却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国防安全。作为“力量”的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使亚细亚主义获得了政策现实性,也迫使满川认识到亚洲各国民族主义与日本为敌的可能,令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反省日本政策中的侵略倾向。满川始终是在“被欧美压迫”的意义上理解亚洲的一体性的,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反抗压迫的亚细亚主义心情终究无法发展成为基于道义和对等关系的国际秩序新理念。

关键词: 满川龟太郎 亚细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现实主义 亚洲民族运动

Abstract

The Asianist Thoughts of Mitsukawa Kametarō around the WWI Period

Mitsukawa Kametarō, the key founder of the Japanese fascist association Yūzonsha, was a devoted adherent of Asianism. The First World War period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his Asianist ideas. During the unfolding of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his sympathy and concern with “Asia” extended to a new geographical magnitude which consisted of nations not only in East Asia, but also India, Central Asia, Middle East, and even Jews and Africans. Despite his endorsement of Japan’s carving up China with European powers in 1913, he began to call for “the liberation of Asia” based on an anticipatory military-economic alliance between revolutionized China and renovated Japan after the Great War.

As a sober political realist, Mitsukawa placed his foreign policy proposal firmly on the ground of Japanese national interest and security rather than his emotion towards Asia. The upsurge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across Asia rendered the “Asian Turn” of Japanese strategy practical for Mitsukawa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power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propelled him to reflect on the strategically risky chauvinism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Mitsukawa’s perception, the Asian oneness relies on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being oppressed by the West. However, the emancipative elements in his “Asianist emotion” is not adequate to transform Asianism into the idea of a moral-based equal world order, due to the entrenched realist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and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in his mentality.

Keyword: Mitsukawa Kametarō, Asianism, WWI, political realism,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概要

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展開——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を中心に

猶存社の創始者の一人である満川亀太郎は忠実なアジア主義者と自称し、そのアジア主義は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をきっかけに著しい展開を見せた。満川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様相は大戦期を通じて「低下期」「移行期」と「完成期」の三つの段階を経て、彼のアジア民族に対する同情と関心が一段と強まっていくと同時に、その「アジア」概念の広さは東アジア諸国からインドや中央アジア・中東地域に広がり、さらにユダヤ人と黒人など被圧迫民族全体を含むに至った。彼によるアジア政策案も「中国分割論」から「日中国防経済同盟」論に転じ、そして大戦終結後に「アジア解放」論を掲げ始めた。

満川亀太郎が熾烈なアジア主義的心情を持つ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国家の利益と安全を最優先にする冷徹な国家理性こそが彼の対外政策論での「アジアへの復帰」をもたらしたものであり、満川思想を貫く特質というべきものでもある。

「パワー」としてのアジア民族運動の抬頭は政策としてのアジア主義に現実味を与えると共に、日本もアジア諸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敵に回されてしまうという可能性を提示し、満川に日本の対外政策における侵略主義への反省を迫った。満川は終始「欧米に圧迫される」という意味で「アジア」の同一性をとらえていたが、現実主義の論理に身を任せたせいで、「圧迫」に抵抗しようとするアジア主義的心情を対等関係と正義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の構想に生まれ変わ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キーワード: 満川亀太郎 アジア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戦 現実主義 アジア民族運動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满川龟太郎：研究意义与现状	1
第二节 亚细亚主义：研究现状与核心问题	4
第三节 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8
第一章 被遗忘的亚洲：1913 至 1915 年	10
第一节 满川亚细亚主义的原点与危机	10
第二节 一战爆发前后的日本国家利益观	12
第三节 “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对华认识	15
第二章 亚细亚主义的回归及其边界：1916 至 1918 年	19
第一节 理解中国革命	19
第二节 中日国防同盟与国防线的南移	23
第三节 “着眼于中亚与印度吧！”	26
第三章 通往“亚细亚解放”的路途：1919 年及以后	32
第一节 “内外皆已途穷”	32
第二节 亚洲民族主义的向背	35
第三节 亚洲解放的宣言	38
结 论	43
参考文献	48
附 录 本文所参考满川龟太郎论文目录	51
致 谢	55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57

绪论

第一节 满川龟太郎：研究意义与现状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两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惨痛的一页。二战后，出于对侵略政策的社会思想基础的考察，出现了许多关于近代日本右翼组织和思想的研究。其中，1919年创立的犹存社作为革新右翼组织的肇始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广泛关注。绪方贞子提出，犹存社的成立使日本国家主义运动首次拥有了具体的纲领目标。¹一般认为，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是犹存社的核心，他们对在国外发动侵华事变、在国内策划政变致使军部掌权的青年军官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北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众多青年将校奉为经典。与北一辉“日本法西斯教祖”的恶名相应，犹存社也被视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起源。²

与成为战后右翼思想研究的明星人物的北和大川相比，犹存社的实际创立者、与北和大川并称犹存社“三尊”的满川龟太郎（みつかわ かめたろう，1888-1936）几乎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满川龟太郎并未像北与大川一般以思想和行动造成直接的政治后果，遭到冷落也是情理之中。但要掌握战前日本右翼运动的发展流变，满川其实是不可忽略的人物。

满川龟太郎生于大阪，长于京都，1909年早稻田大学肄业后以撰写新闻评论维生，曾担任《民声新闻》、《海国日报》主笔和杂志《大日本》编辑，1920年辞职后专事“国家改造”运动，1936年因脑溢血去世。满川是犹存社的发起者和命名者，将大川周明介绍给北一辉的是满川，邀请北一辉指导犹存社进行“国家改造”的亦是满川：大川周明1919年8月受满川派遣前往上海迎接滞留中国的北一辉，并带回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³的手稿。将结成天剑党向青年军官宣传北一辉思想的西田税介绍给北的还是满川。桥川文三认为，犹存社成立的基础正是“北一辉的思想与理论、大川周明的行动力、满川龟太郎的人格与统率力的三位一体”。⁴可以说满川龟太郎是使“革新右翼”的各支流在一战后交汇的枢纽人物，他在北与大川决裂后仍试图修复两人的关系，始终致力于“国家改造”运动内部的团结。

除了在右翼运动中发挥协调组织机能之外，满川龟太郎的思想中也包含着长久被北和大川的光芒所掩盖的独特性。作为活跃于报刊论坛上的新闻工作者，满川在职业生涯中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时评论文。他的代表作有《列强领土及经济上的发展》（1918）、《被夺走的亚细

¹ [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李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² [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9页。

³ 原题为《国家改造法案原理大纲》，后来在1923年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本研究不关注各版本间的内容差异，对该书的提及一律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或《法案大纲》代称，引用参考的是1959年版《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所收《国家改造法案原理大纲》。北一辉次郎『北一輝著作集 第二卷』みすず書房，1972年。

⁴ 橋川文三「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推進力」、橋川文三著、筒井清忠編『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125頁。

亚》(1921)、《黑人问题》(1925)、《东西人种斗争史观》(1926)、《犹太祸的迷妄》(1929)和回忆录《三国干涉以后》(1935)。这些著作论文是了解其思想必须依据的文本。法西斯主义者一般将共产主义当做大敌,北一辉一贯认为俄国(苏联)是日本的最大威胁之一,然而满川在1919年就已提出改善日苏关系,后来又将列宁视为俄国的拯救者,称苏联为“伟大的明日之国”。⁵满川还对黑人和犹太人怀有深切同情,他在1920年代反犹太主义风行日本时,与鼓吹犹太阴谋论的右翼人士展开了激烈论战,从种族平等的角度批判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不可能使德国实现复兴。⁶

此外,不同于北与大川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满川与1930年代的一连串“昭和维新”政变行动都保持了距离,他虽对直接行动的青年军人怀有敬意,但又提出“‘若无斩人如斩萝卜之大胆则革命事业难成’云云,我认为在日本乃是外道”⁷,隐晦地对以恐怖手段发动政变的做法表达了批评。这些片段体现了满川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性。满川认为若日本不能争取亚洲各国的衷心同情,日美开战时中国必将站在美国一边,而“吾人与支那战于陆上,与美国战于海上,果将坚持几年”,⁸预见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困境。什皮尔曼在探讨满川的思想独特性后甚至断言:“忽略掉满川的存在,就无法正确地把握老社会与犹存社的性质、乃至日本革新右翼的性质”,⁹提示了以满川研究修正当前的犹存社研究、革新右翼研究的可能。

遗憾的是,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在右翼思想与运动中的地位太过突出,再加上史料获取的问题,¹⁰满川龟太郎长期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战后右翼研究中对满川的提及始于对犹存社之特殊地位的发现,如丸山真男1947年的论文《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和运动》和上文提及的桥川文三的表述,都提到满川作为犹存社的创始人之一的地位。但去除犹存社的标签、探询满川个体的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则肇始于1970年代,最早的是松本健一1973年的论文《大亚细亚主义的虚妄——满川龟太郎与下中弥三郎论》,其中关于满川的部分从他1920年以后的著作抽出了满川的亚细亚主义思想,探讨了亚细亚主义与日本改造的关系。但该文运用的史料非常有限,甚至出现了混淆历史人物的基本史实错误。¹¹此后三十年间几

⁵ 参见满川龟太郎『激变渦中の世界と日本』先進社、1932年、237頁; 满川龟太郎『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論創社、2013年、157頁。

⁶ 满川「世界の人類問題」、『錦旗』1934年3月号、97頁。转引自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近代日本の革新論とアジア主義——北一輝、大川周明、満川亀太郎らの思想と行動』蘆書房、2015年、105頁。

⁷ 满川龟太郎『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0頁。

⁸ 满川龜太郎「日米戦争の利害」、『奪はれたる亜細亞』広文堂書店、1921年、356頁。

⁹ 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近代日本の革新論とアジア主義——北一輝、大川周明、満川亀太郎らの思想と行動』、105頁。

¹⁰ 满川的个人资料文书在2010年才首次在家属同意后得到公开。

¹¹ 松本健一「大亜細亞主義の虚妄——満川亀太郎・下中弥三郎論」、『革命的ロマン主義の位相』伝統と

乎不见对满川的研究，到了2008年才开始出现利用满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评论文系统探讨其行动和思想的研究。

2010年，经满川的外孙女原真理之手，满川的个人资料文书首次得到公开。此后的满川研究在史料的丰富程度和视野的广度上都有了明显提升。整理满川史料的长谷川雄一、什皮尔曼（Christopher W. A. Szpilman）等学者为介绍这批材料，撰写了不少直接利用新史料的论文，如满川日记的“解题”，¹²再如基于满川的书信对他与北、大川之间交往细节的考察，¹³以及对满川与青年将校、革新右翼运动家、反犹主义者等不同群体往来的考察。¹⁴首部满川龟太郎的评传是由福家崇洋2016年出版的《满川龟太郎：慷慨志犹存》。该书记述了满川一生中的活动，全面地提及了与他相关的社团、组织与人物，为确定满川在右翼运动中的位置提供了线索。福家还系统利用了满川少年时期数量庞大的《漂流日记》，还原了少年满川思想世界生成的过程，填补了对满川中小学时代的研究空白，但该书全而不精，缺乏中心，尤其疏于梳理满川成年以后经历的思想演变。¹⁵

而聚焦于满川智识发展的特定阶段考察梳理其思想的研究，有刈田彻基于满川在《民声新闻》《海国日报》上所发文章对其1906至1912年间思想言论的文本分析，¹⁶长谷川雄一对满川1914年以前的亚细亚主义思想的考察，¹⁷以及萩原稔对满川1930年代的国际局势认识的考察。¹⁸

综观满川龟太郎的人物研究现状，可以把握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总的来说，目前的满川研究仍处于填补空白的阶段，呈现出重述轻论的特征。从研究角度与关注时段来说，现有研究大多聚集于（1）满川青少年时期（1914年以前）的思想形成与（2）创办老社会 and 犹存社以后（1919年以后）满川在国家改造运动中的活跃两个板块，一方面尚未出现对整个

現代社、1973年。松本在行文中将满川所在的《大日本》社的川岛（清治郎）社长当成了著名的“支那通”川岛浪速。

¹² 长谷川雄一「解題：『行余日誌』（大正八年）、『流水日記』（大正十年）」、満川亀太郎著、長谷川雄一／C・W・A・スピルマン／福家崇洋編『満川亀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論創社、2011年。

¹³ 長谷川雄一「猶存社の三尊——北一輝・大川周明と満川亀太郎の交誼」、長谷川雄一／C・W・A・スピルマン／今津敏晃編『満川亀太郎書簡集——北一輝・大川周明・西田税らの書簡集』論創社、2012年。

¹⁴ 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満川亀太郎宛書簡に見る青年将校、革新運動家、陰謀史観論者」、長谷川雄一ら編『満川亀太郎書簡集——北一輝・大川周明・西田税らの書簡集』。

¹⁵ 福家崇洋『満川亀太郎：慷慨の志猶存す』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年。

¹⁶ 刈田徹「満川亀太郎の青少年期の思想と行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その民声新聞時代を中心に」、『政治・経済・法律研究』十〇巻二号、2008年3月。刈田徹「満川亀太郎の青少年期の思想と行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その『海国日報』記者時代を中心に」、『政治・経済・法律研究』十二巻二号、2010年3月。

¹⁷ 長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長谷川雄一編著『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

¹⁸ 萩原稔「1930年代の日本の右翼思想家の対外認識——満川亀太郎・北一輝を中心に」、伊藤信哉／萩原稔編著『近代日本の対外認識Ⅰ』彩流社、2015年。

一战期间其思想和活动的细致梳理，另一方面对一战以后满川的考察也是行动重于思想，对其革新右翼活动的探讨尚停留在事实确认层面，未能就他对国家改造的时机判断、手段选择的思考进行挖掘，无法解释他为何最终与“昭和维新”行动保持距离。

从研究方法上看，许多研究过度依赖满川的回忆录《三国干涉以后》的叙事，疏于批判其中潜在的自我辩解与细节隐藏，从而忽略满川的思想所经历的变化，陷入了非历史的静态研究之中。就以发展流变的眼光看待满川的思想而言，长谷川雄一的论文具有重要意义，他挑战了由满川自己提出的观点：三国干涉还辽是促使满川产生亚细亚主义的直接原因；提出真正影响青少年时代的满川的国际认识的，是稻垣满次郎和肝付兼行的著作。¹⁹

由此观之，未来的满川研究须更多依靠时评、论文、日记及书简等即时文本，减少对回顾式叙述的依赖，充分关注满川龟太郎 1914 年以后的思想内容及其演变，立足于其成熟期的思想，探讨满川同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在思想上的关联与差异。基于对上述现有研究之缺陷的认识，本研究将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满川龟太郎的动向，从亚细亚主义入手探讨满川在一战前后的思想发展。

第二节 亚细亚主义：研究现状与核心问题

满川在回忆录中将“国家改造和亚细亚复兴问题”称作自己“生涯的事业”。²⁰事实上，对犹存社所代表的革新右翼而言，“国家改造”与亚洲复兴是密不可分的。丸山真男将把“建设革命日本”的国内改造与“解放亚洲民族”的国际主张联系起来观点视作“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²¹桥川文三指出，虽然传统右翼组织也提倡亚细亚主义，但革新右翼则打出了“没有国内改造便没有真正的亚洲经纶”的视角，即让亚洲解放赋予国家改造以价值。²²平凡社 1988 年版的《世界百科事典》将亚细亚主义的最大特征定义为“（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连横，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但在实际上“发挥了使日本取列强而代之侵略亚洲的作用”，²³这一内在矛盾在高呼“亚洲解放”却直接推动了日本亚洲侵略的革新右翼身上以最惨烈的形式显现出来，满川龟太郎亦不能自外于这一内嵌于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分裂。

亚细亚主义曾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服务于日本的亚洲侵略战争，因此相关研究同样起源于战后学界的战争反思，最初将亚细亚主义置于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文脉之

¹⁹ 长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117頁。

²⁰ 満川亀太郎『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27頁。

²¹ 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の思想和行動》，《現代政治の思想和行動》，第29頁。

²² 橋川文三「昭和維新の論理と心理」、『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65頁。

²³ 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6-17 页。

中考察。²⁴但从 1960 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亚细亚主义研究都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包装过的侵略主义”到关注“早期亚洲主义”的转向，即将视野拓展到日本近代早期，尝试通过分期或分类，发现“日本与亚洲各国对等连带”的非侵略型“早期亚洲主义”，还原出“亚洲各国团结协作对抗欧美”的朴素心情，以此作为亚细亚主义的原点重新为其定性。²⁵质疑早期亚细亚主义能否作为独立范畴的声音也频繁出现。²⁶但不论是否认可早期亚洲主义作为“健全原型”的特殊性，研究者大多赞同把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当做亚细亚主义与侵略主义汇集的关键时期。

竹内好主编的《亚细亚主义》是战后首部系统关注亚细亚主义的学术文献，为战后学界筑成了讨论亚细亚主义的基础。他是最早否认在亚细亚主义中区分侵略型与非侵略型的意义的学者，认为亚细亚主义始终处于“侵略主义和连带意识微妙的分离与结合状态”，早期民权派的亚洲连带论中亦有扩张倾向，黑龙会的“大亚细亚主义”中也存在对亚洲民族的真实同情。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竹内好提出的亚细亚主义“心情”这一概念直接启发了上述探寻早期亚细亚主义的研究。他区分了亚细亚主义的“心情”与“逻辑”，认为进入 20 世纪后，尽管宫崎滔天式的对亚洲的深挚同情作为“心情”一直存在，但亚细亚主义却一味以黑龙会式的侵略主义逻辑展开。他对亚细亚主义的“心情”未能升华为“思想”——未能孕育出足以审判包括帝国主义的西洋文明的新价值——流露了惋惜。²⁷

然而，诸多学者对亚细亚主义“心情”的价值表示了根本怀疑。早在 1949 年丸山真男就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具有高超的自我欺骗能力，“在自己的现实行动不断违背主观意图的

²⁴ 如丸山真男提出亚细亚主义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特征之一，“从欧洲的压力下解放东亚的动向”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取代欧洲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但“解放亚洲”最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纯粉饰。井上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也从反省帝国主义的视角批判了樽井藤吉的日韩合邦论与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第 页；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3-134 页。

²⁵ 此类路径的代表者在日本有野原四郎、狭间直树等，在中国有王屏、盛邦和、杨栋梁等。野原四郎认为明治初期的亚细亚主义与自由民权运动相结合，主张亚洲各国的平等连带，而随着民权论的衰落与国权论的兴起，亚细亚主义成了隐瞒日本亚洲侵略政策的工具。狭间直树在论文《关于早期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中根据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在“亚细亚”这一框架中的相对位置，以 1898 年与 1928 年为两个转折点，将日本近代亚细亚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他强调在兴亚会、善邻译书馆等明治前中期民间组织的活动中，存在着毫无侵略倾向的对等合作意识。王屏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区分了亚细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三种“表现形式”，她在狭间直树的分期方式的基础上，提出 1898 年以前的亚细亚主义是基于“东方精神/亚洲价值观”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在 1898 至 1928 年期间则发展为以“日本主义”为底色的“扩张性亚细亚主义”，到了 1928 年以后则沦为了服务于“大陆政策”的侵略主义。而杨栋梁、王美平则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集合本身就包括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彼此间目标和手段不同。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1) 序章 アジア主義とはなにか」、『東亜』No.410、2001 年 8 月号；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继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 年第 3 期。

²⁶ 此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论者是竹内好。此外，杨栋梁、王美平在为早期亚洲主义分类时便已承认，“在进入具体人物、组织或事件的分析时，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明了”。刘峰认为亚细亚主义在早期虽有“健全原型”，但不成气候、缺乏体系，当亚细亚主义最终在 1890 年代“定型”时，它已经彻底倒向扩张主义了。参见刘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²⁷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竹内好編『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1963 年。

过程中行进，‘欲善而常为恶’”。²⁸当实际行动偏离主观意图成为常态时，重要的是行动及其结果，是否拥有对亚洲的善意根本无足轻重。坂野润治主张重视“连带”“脱亚”等言辞背后对亚洲形势的具体认识和具体政策提议，提出亚细亚主义落实到对外政策层次上与“脱亚论”并无实质差异；坂野将明治国家的对外扩张比作身体的成长这一不言自明的过程，不论是亚细亚主义者还是脱亚论者，都将“履行‘扩张’的使命”作为前提，即便存在对扩张的批判，也只是挂在嘴上的“言辞”，不会质疑成为“扩张”之受益者的自身。²⁹这些研究旨在破除自我感动的浪漫幻想，揭示了压倒“心情”的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性。

此外，也有学者批判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论忽略了对“亚洲”含义的具体分析。竹内好按体系化程度将亚细亚主义者们的思想分为“倾向性”和“思想”（或是“心情”与“逻辑”）两个层次。但判断在二者的关联方式时，他显示了迟疑与矛盾：“倾向性”究竟是仅附着于内含价值的“思想”上的异质存在，还是“思想”产生的基盘？³⁰问题的核心是如果抽去“亚细亚连带”这一框架，各自内含价值的“思想”能否仍然成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论文集《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集中考察了近代日本语境下的“亚细亚”概念。山室信一认为，“文明”与“人种”构成了近代日本亚洲论说的两大中轴，而日本的亚洲认识在只不过是延伸的日本自我认识。³¹古屋哲夫追问“亚细亚”这一表述的具体内涵，致力于探明为什么“亚细亚”被提起、经由“亚细亚”一词什么得以讲述等问题；他同山室一样关注“亚细亚”一词所指的具体地域范围，认为当日本关注的焦点位于朝鲜、中国，或在观念上把亚洲划分为多个区域³²时，亚细亚主义都很难诞生。

上述梳理远未穷尽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但凸显了亚细亚主义论争讨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其一是竹内好所作的“心情”与“逻辑”（或“倾向性”与“思想”）的区分，即亚细亚主义研究既须探询真实的同情与认同是否存在，也须关注亚洲秩序构想、对外政策提言及其论证方式。其二是对亚细亚主义“心情”之价值的质疑，即对亚洲各国的主观善意是否足以抗衡国家理性，³³在政策提案与实际行动上拒斥帝国主义。其三是对亚细亚主义中的“亚细亚/亚

²⁸ 丸山真男：《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第94页。

²⁹ 坂野润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思想の実像』ちくま学芸文庫、2013年。同时参考该书末尾所附苅部直的解说文「解説 『脱亜論』と『アジア主義』のまぼろし」。

³⁰ 尽管竹内好强调亚细亚主义必然依附于其他思想，但又提及“除了‘亚细亚主义’无法称呼的心情基调，以及在其基础上构筑的思想”。竹内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アジア主義』、第13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³¹ 山室信一「アジア認識の基軸」、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³² 古屋此处所指的是日俄战争后兴起的南北进守的论争。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

³³ 国家理性，即“raison d'état”或“reason of state”，在汉语中也译为“国家理由”。考虑到“reason of state”这一概念的产生、传播和相关讨论都是在与“理性”观念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除引文外，本文中一律采用“国家理性”的表述。（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读书》2010年第4期。）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梳理国家理性概念的历史演变时提出，国家理性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是在就国家本身及其外部环境形成恰当理解的基础上，对维持国家的健康和力量的最优途径的选择；为了实现国家福祉，在必要情况下必须以牺牲道德和实在法为代价获取和

洲”框架进行再思考，考察“亚洲”包括哪些具体地域、何以论证“亚洲”的同一性、“亚洲”能否成为一个内含价值的自足概念等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对日本近代知识人个体的亚细亚主义思想的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对满川龟太郎亚细亚主义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满川入手考察亚细亚主义的意义，在于他的个体经验在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上都具有典型性，从而可能丰富学界对亚细亚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人全然将亚洲当成实现日本一国利益之工具的“亚细亚主义”，满川对亚洲一贯怀有诚挚而非功利的关心与同情，早在中学时代，他便阅读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对中国革命抱有关心，甚至梦见过和孙中山相会，此后一生中诸多中国、印度的革命流亡志士保有亲交。另一方面，他每日通读新闻把握最新的国内外政局动态，并作为以撰写时事评论为业的新闻工作者，频繁发表关于日本国内政治、军备政策、教育政策、对外政策及殖民政策的构想与提案。正如后文具体分析将展现的，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包括主情的关切认同与主理的亚洲政策构想，并同时体现了强烈的“心情”与冷彻的现实主义。学生时代的满川曾明言要“排斥使弱者困窘行窃取强盗的恶魔，排斥受一时伪爱国心驱使行侵略掠夺之事的怪物”，³⁴而考察“心情”与国家理性在满川成年后的思想中的竞争，检视他能否保有基于道义的帝国主义批判，也有利于检视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与边界。

同时，什皮尔曼与长谷川雄一认为，满川龟太郎的亚细亚主义的先驱性正体现在极其广阔的亚洲视野上，指出“(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亚细亚主义的)‘亚洲’被限定在东亚，对冈仓(天心)来说还包括印度……在这种狭义的亚细亚主义居于主流的当时，满川将整个亚洲大陆纳入视野的亚细亚主义是全新的”。³⁵一般认为，亚细亚主义者们开始关注印度以西的地域始于大川周明，但大川介绍印度以西的亚洲地域的《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的成书结构有着受到满川《被夺走的亚细亚》影响的明显痕迹。³⁶满川所构想的亚细亚主义不仅包括东亚和印度，还把中亚地区作为对象，甚至将黑人和犹太人等“所有被压迫民族”纳入视野。探讨满川极其宽广的“亚洲”概念的形成过程，和他论证亚洲同一性的方式，对于理解近代日本亚洲认识的深层逻辑也是有益的。

本文将考察满川亚细亚主义的焦点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前后。³⁷如此选择，既

维持权力。〔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51-53 页。〕参考迈内克的论述，本文也从（1）以本国的利益福祉为最高价值、（2）重视权力在实现国家利益中的根本作用和（3）基于对现实环境的准确把握优化国家行为的工具理性这三个维度理解并使用“国家理性”概念。

³⁴ 满川龟太郎『理想の日本』，1906 年。转引自长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125 頁。

³⁵ C·W·A·スピルマン / 長谷川雄一「解説」、満川亀太郎『奪われたるアジア』書肆心水、2007 年、372-373 頁。

³⁶ 同前，373 頁。

³⁷ 对于亚细亚主义在一战这一特定国际环境下呈现的样貌与发展的讨论直到近 10 年才开始。斯文·萨勒

是由于目前尚无关注这一时期满川动向的研究,也是由于这一时期是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尽管满川自身在日后坚称自己是亚细亚主义者,但事实上其亚细亚主义并非是在他在《被夺走的亚细亚》序言中描绘的一条从三国干涉的激愤中平直生长出的连续直线,反而充斥着波折与摇摆。在1913年尚且将亚洲门罗主义斥为幻想的满川,在1919年却已高呼亚洲解放。长谷川雄一在考察了满川1906至1913年间的亚细亚主义萌芽的基础上提出,经由一战期间与亚洲革命运动家的交往,满川的亚细亚主义从观念的、抽象的逐渐转变为实践的、具体的。³⁸对一战时期的考察最能揭示满川的亚细亚主义经历的演变与成型。而如后文将展示的,一战带来的国际局势变动首次为满川提供了在亚细亚主义心情与具体对外政略间架起桥梁的机会,也因而成为检视“心情”与国家理性纠缠与竞争的绝佳时期。同时,一战期间见证了他不断拓展与确定“亚洲”边界的尝试,为同时代人与当代学者所关注的满川极其广阔的“亚洲”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才最终形成。

第三节 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综合先行研究提供的视角和留下的问题,本文将(1)阐明满川龟太郎在一战前后实现的智识与思想发展和(2)通过满川的个案讨论亚细亚主义的发生机制与内在病理作为两个研究目标。本文根据是否主张亚洲连带,以及连带方案的空间广度与急进程度,将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一战前后经历的演进分为“低落期(1913-1915)”“过渡期(1916-1918)”“成型期(1919-)”三个阶段,分别在正文的三章中予以考察。第一章将在简要回顾满川一战以前的亚洲认识的基础上,梳理满川在一战爆发前后的国际政治观和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对华认识。第二章将从满川在1916年初的思想转变入手,探讨满川的兴亚理想在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的影响下复燃的过程,同时立足于满川在1916-1918年关于中国与中西亚的密集论述,指明满川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在该时期内的进展及边界。第三章将讨论满川是如何在一战结束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动中突破其亚细亚主义此前的边界、提出“亚洲解放”这一目标的。

作为本文聚焦时段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开始,至1918年11月结束,但由

主张一战是亚细亚主义发展的分水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众多具体而系统的亚细亚主义构想得以发表,‘亚细亚主义’的表述也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被恒常使用”,并将小寺谦吉1916年11月出版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作为这一转变的开端。王美平也根据《大亚细亚主义论》讨论了小寺谦吉的亚洲主义理论。翟新和刘峰各自考察了一战期间日本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时代背景,都提出一战中日本萌发的“大国意识”、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评估和对欧美不信感的加深推动了亚细亚主义的加速发展。除此之外,徐国琦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置于一战期间亚洲各国的共同经验之中,探讨了“凡尔赛的背叛”刺激日本、中国与印度等亚洲民族设想亚洲联合的过程。这些研究认识到了战时期对亚细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但缺乏对局势的流变同知识人及其亚细亚主义思想的互动过程的实证。

³⁸ 长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142頁。

于与一战相关的巴黎和会和战后亚非民族运动也直接影响了满川的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因此本文也会讨论满川在一战结束后的思想状况，并将满川系统提出亚细亚主义理论的《被夺走的亚细亚》序言执笔的1920年底作为这段思想航程暂时的终点。此外，为了展示满川的亚细亚主义演变的原点，在第一章的开头也会简要涉及1914年以前的内容。

然而，在凭借“最低限度的亚细亚主义”的标准粗线条地勾勒出满川的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变化之外，本研究也将对他每一阶段的亚细亚主义的内容与性质进行探询，具体来说将围绕下列问题展开：满川是否怀有对亚洲民族的关心、同情或认同（“心情”是否存在）？他是否提出了关于亚洲的政策构想，其内容为何，细致具体到何种程度，以什么逻辑论证？这些政策提案倾向于遏制帝国主义，还是正当化侵略扩张？是什么令他的亚细亚主义出现摇摆？有哪些区域被他纳入亚细亚主义的议程之中，它们为何是‘亚洲’的一部分？本文将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回应先行研究提出的问题点，反思亚细亚主义中是否蕴藏着审判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满川龟太郎在1914至1920年间几乎没有留下日记（除了1919年3至4月的《行余日志》），他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也残缺不全。³⁹因此本文依靠的主要史料是他一战期间作为新闻人所发表的时评论文，这些文章集中于《经济时报》《大日本》《亚细亚时论》等刊物上。但这些新闻评论在执笔时便已意识到读者之视线与可能的新闻审查，因而也难免有言辞含糊与自我美化的缺陷，在分析时须保持十足的警惕。满川1935年的自传《三国干涉以后》与友人的回忆也将得到批判性利用。

本研究在史料上的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满川匿名或以笔名发表、而此前研究皆未注意的多篇文章。满川一生中笔名繁多，直到1916年以后才增加以真名发表文章的频率，这为完整搜集其文献增加了难度。福家崇洋指出满川用过的笔名有（满川）晓峰、南溟庵（主人）、矢来台人、剑书楼（客）。⁴⁰通过与已确知为满川所作的文章进行内容对比，本研究发现“犹存楼客”在杂志《大日本》上发表的诸多文章亦出自满川之手。⁴¹此外，杂志《大日本》每期都会发表数篇编辑局成员所写的匿名社论，其中一些被满川收入自己的文集《被夺走的亚细亚》，另一些被满川在其他场合承认为自己所作。本文将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构建更全面的满川形象。文末将列出满川一战期间的文献列表，供研究者批评参考。

³⁹ 长谷川雄一认为，满川非常注意不让官方发现他展开活动的行迹，猜测满川一面有意识地处理掉了“不方便”的书信，一面也不再像少年时期的《漂流日记》留下详细的日记。

⁴⁰ 福家崇洋『満川亀太郎：慷慨の志猶存す』、96頁。

⁴¹ 如「猶存楼客」国防的結論としての亜細亜主義、『大日本』1917年7月号 和 曉峰生「急務閑談」、『経済時報』1917年8月号。

第一章 被遗忘的亚洲：1913 至 1915 年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于日本来说，欧洲的大战预示着国际秩序剧变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汲汲于战争的欧洲列强一时将无暇扩张在东亚的利益。大战的爆发使一股“权益扩张热潮”席卷日本社会，从元老、官僚到政党人士、民间右翼，各界的利益扩张设想最终经日本政府汇成了 1915 年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另一方面，经过与元老协商，大隈重信内阁决定以日英同盟为由参战，谋求战后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在华权益的扩张。日本于 1914 年 8 月 23 日与德国断交，随后出兵占领了德属南太平洋群岛和德国在中国山东青岛的租借地。

满川龟太郎敏锐地捕捉到了大战带来的变局和机运，认为大战将带来“使世界之政治经济一变”、“历史上的大革命出现”的时机。⁴²本章将梳理满川在一战爆发前后的观点，致力于描摹他在亚细亚主义“低落期”的亚洲认识和他对日本之国是的界定，分析其国家理性的逻辑。在详细探讨满川一战前后的思想体系前，本章第一节将简要回顾满川在一战爆发以前的亚细亚主义思想雏形及其在 1913 年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讨论一战期间其亚细亚主义演变的基础。

第一节 满川亚细亚主义的原点与危机

对亚洲问题的关注发端于满川的少年时代，对东亚局势的评论散见于他学生时代的日记与手制报纸上，并体现在集其早期思想之大成的《理想之日本》一书中。⁴³1908 年连载于《民声新闻》的《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一文系统地呈现了他亚细亚主义思想原型期的各个要素。⁴⁴

在《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中，满川通过对亚洲文明昔日荣光的想象，完成了对“亚洲”身份的认同，质疑了白人优越性的神话：“忆夫亚细亚人，乃世界中最高贵之人类也。世界最古之文明，其曙光实由亚细亚人所放，其宗教文学哲学皆无外乎由亚细亚人发生之”。在孔子、释迦与默罕默德等思想大师的“灵之活动”以外，由成吉思汗所代表的军事成就则证明，在武力方面亚洲同样能够称雄于世界。他进一步提出，正是亚洲人民对于亚洲历史成就的记忆使他们得以维持民族特性，即便国家灭亡，民族也依然存在。⁴⁵与此同时，被欧洲列

⁴² 满川晓峰「大戦亂と將來の國際政局」、『經濟時報』1914 年 9 月号。

⁴³ 《理想之日本》是满川在 1906 年十八岁时写成的著作，他曾尝试通过东京警醒社出版该书而无果，此后终生未公刊该书。全书共六章，分别为“大日本帝国”、“战后经营”、“国家地位”、“国民地位”、“日本之命运”和“国家之使命与国民之自觉”。该书手稿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室。

⁴⁴ 《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从 1908 年 8 月至 9 月分八次连载于《民声新闻》上，在此后又转载于《经济时报》1911 年 1 月号上。本文所参考的是《经济时报》的转载版本。满川晓峰「亞細亞問題の研究」『經濟時報』1911 年新年号。

⁴⁵ 「亞細亞問題の研究」、6-7 頁。

强压迫的亚洲形象也清晰地呈现在满川的意识中：“亚细亚诸邦或亡或隶属于欧洲诸强。求今完全独立国时，只数日本清国暹罗之三……而清国暹罗亦蒙白祸久矣。”⁴⁶在上述逻辑中，亚洲的特性在于辉煌的历史成就、遭受列强武力压迫和同属黄种人这三点。

满川预测未来黄种人与白人的冲突将无可避免，但对 1908 年的他来说，人种冲突的危机感并不急迫，人种战争的“时机是在百年后还是千年后到来无法明言”。⁴⁷另一方面，中国在 20 世纪初逐渐抬头的回收利权运动与印度民众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令满川对亚洲复兴怀有期待，他相信亚洲民族尽管目前屈服于欧洲，但终将建成巩固的独立国家。⁴⁸作为结论，满川提出了主张“亚细亚必须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的“亚洲门罗主义”，而日本作为唯一独立性完好的亚洲国家，有责任引导“亚洲门罗主义”，使其顺应世界大势，目前的急务是将首先列强的势力扫出中国。⁴⁹

由此，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已形成了最初的体系——亚洲身份认同、欧美（白人）与亚洲（黄种人）的对立、亚洲独立复兴的目标、亚洲民族运动的乐观前景，这些要素构成了满川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原型。但必须注意的是，生长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后的满川从一开始便已将日本作为“盟主”的优越地位嵌入其亚细亚主义思想中。此外，尽管他在《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中通篇使用“亚细亚”一词，但所提及的亚洲国家只有日本、中国、暹罗与印度，“亚洲门罗主义”的具体政策意涵也模糊不清，不论是“亚洲”概念还是亚细亚主义的内容都相当抽象。这既反映 1908 年的满川对亚洲各国尚无具体深入的认识，也证实了亚细亚主义此时对他来说缺乏政策现实性。

正因如此，此后东亚局势的变化立即使满川全盘否定了“亚洲门罗主义”。满川在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期望，认为其影响将波及印度、阿富汗与土耳其。但随着 1913 年二次革命以革命党人逃亡海外、袁世凯大权独揽告终，对“大奸物”袁世凯深恶痛绝的满川也对袁政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转为悲观，他断言：“袁世凯称帝之时，就是中国灭亡的一道闪光。”⁵⁰在 1913 年 11 年的时评《敌乎友乎》中，满川自嘲地宣布放弃过去曾主张的中国保全论与“亚洲门罗主义”：中国内部早已腐坏，现在提倡指导或保护中国反而将与欧洲列强发生冲突，丧失日本在大陆上的地位。他质问：

“日本果将同何处之亚细亚人同盟，以应对击退将来之白祸欤？可与四亿支那人相结乎？可与二亿印度人相结乎？乃至可与二亿回教徒相结乎？结罢果能举预期之效果乎？此

⁴⁶ 同前，7 頁。

⁴⁷ 同前，8 頁。

⁴⁸ 同前，7 頁。

⁴⁹ 同前，10 頁。

⁵⁰ 滿川曉峯「亡國への支那」、『經濟時報』1913 年 9 月号、4 頁。

重大疑问也。由来一国之亡，非其国民皆为贪于私利而无热烈之爱国精神者乎？”⁵¹

在《敌乎友乎》一文体现的思想转向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亚洲各国的民族自觉意识是满川判断一个国家前景的重要标准，也是“日本作为盟主引导亚洲”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革命与印度反抗运动的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亚洲形象是自私的亡国民族之集合。其二，面对生存危机，抽象的兴亚目标必将让位于日本国家利益，日本必须以露骨的现实政治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求一席之地——日本目前的南进战略已受阻于美英德，必须果断地与俄国携手，创立大陆政策的基础。⁵²满川在认定中国必将灭亡后，便转而支持中国分割论，⁵³此处的帝国主义色彩此后也将继续存在于满川的思维方式中。青少年时期的亚细亚主义萌芽在 1913 年似已夭折。

第二节 一战爆发前后的日本国家利益观

随着满川在 1913 年放弃对亚洲复兴的期待，“亚洲”似乎从他的思想中消失了。纵观他 1914 至 1915 年间发表的时评论文，除去将在后文考察的关于对华“二十一条”交涉的观点外，几乎不见对亚洲国家的提及。他在这一时期将全部关切集中到了日本的生存发展之上——其中最让他感到迫切的是日本的人地矛盾与海外拓殖问题，而这又与他的国际政治观密切相关。本节将从一战爆发前后满川的日本战略设想入手，梳理满川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内容界定和论证逻辑。

和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浸透在满川的思想之中，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成为他思考日本之将来的前提。在 1915 年 3 月发表的《日本发展新论》中，满川断言“近代国家间之不断竞争由优胜劣败之大原则所支配，各国皆为自我保存采取一切政治或经济措施”，⁵⁴而未来民族间的生存竞争将愈发激烈。另一方面，他深信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道德的无效：“当至国家与国家之争，可与之裁判者，于今日之世界无一，必然胜者善、负者恶”，⁵⁵在生存竞争的背景下，善恶道德从属于权力关系，本民族的生存即为国家最高的行为准则，置他人于死地虽然违背慈悲之心，但“事实终压服理论，万不得已”。⁵⁶

进一步地，他基于一种血统决定论的视角，将民族的生存与人口增殖、子孙繁衍等同起来：“若将国家之进步、民族之发展缩小来看，与个人之生殖无任何意义殊异”，⁵⁷若要保存

⁵¹ 满川晓峰「敵か味方か」、『經濟時報』1913 年 11 月号、9 頁。

⁵² 同前。

⁵³ 「亡國への支那」、4 頁；「敵か味方か」、9 頁。

⁵⁴ 满川龜太郎「發展日本新論」、『經濟時報』1915 年 3 月号、6 頁。

⁵⁵ 满川晓峰「大戦亂と將來の國際政局」、『經濟時報』1914 年 9 月号、18 頁。

⁵⁶ 满川晓峰「國民の健康問題と民族競争」、『經濟時報』1914 年 8 月号、17 頁。

⁵⁷ 「發展日本新論」、6 頁。

国家，必须创造子孙。既然人口增长成为了绝对可欲的目标，那么采取措施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也无可避免。对于满川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手段即是获取土地，他将近代国家生存竞争的本质视为人与土地的矛盾，认为国民增长土地却狭小的国家势必向他处扩张，“一切国际间的交涉由此产生”。⁵⁸

在一个步入工业化的社会中，获得人口生活资料的手段当然不止土地一途，但土地对满川而言还有另一层意义：农民与乡村构成了对抗社会分裂与堕落的坚实堡垒。满川认为，纵观历史上国家的兴亡，以工商业立国者最终都陷入贫富分化相斗的困局；唯有维持庞大的中等阶级——在满川的语境下乃是自耕农阶级——方可防止社会的分裂与国家的灭亡。⁵⁹此外，在满川眼中，城市生活将恶化国民体质、催生精神腐坏，而农村生活能助人保持开拓精神和强健的体魄。⁶⁰因此，满川视农村为国家力量的来源之一，反对某些学者提倡的“工业立国主义”，⁶¹并明言“维持农民势必谋求领土的扩张”。⁶²满川认为日本正面临着人地矛盾引起的深刻生存危机：世界各国人口增长速度日本排第三位，半世纪内日本人口将突破一亿，而“今后二十年间日本的土地能否翻倍却不确定”。⁶³由此，加紧海外拓殖便成了他解决日本生存问题的归结。

在日本吞并朝鲜、获得在满权益后，日本国内围绕拓展势力范围的方向，展开了“南北进守”的辩论，满川亦加入其中。早在学生时代，满川即认为日本基于地理与历史上的联系，将来必然向太平洋发展，他于1914年5、6、11月分三次发表了论文《南北进守的论争》，强调俄国南下获取出海口的决心非日本可轻易抗衡，而无论南进北进都存在日美战争的危险，⁶⁴因此，选择南进北守，与俄国交好而只与美国一国为敌，对日本更有利。在世界大战爆发后，满川也受到权益扩张热潮的影响，视列强忙于战争的当下为日本海外扩张的良机，提出“今日恐已非磨蹭评议南北进守之时”，不问南北，只要可以便须尽力扩张。⁶⁵

对满川而言，海外拓殖的本质与目的是通过人口移动和生产活动缓解日本国内的“生存危机”。但他认为“商业上的利益必须以武力保护”，并不否认侵吞他国领土的选项。他提出，“若无法以武力侵略之手段侵吞外国之领土，于商业于经济上将之加于我势力范围则毫无问题，列国在支那不就如此吗”，⁶⁶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瓜分视作日本应效仿的策略。而无法直

⁵⁸ 同前、7頁。

⁵⁹ 滿川曉峰「南北進守の論争」、『經濟時報』1914年11月号、9頁。

⁶⁰ 「國民の健康問題と民族競争」、16-17頁。

⁶¹ 「發展日本新論」、7頁。

⁶² 「南北進守の論争」、9頁。

⁶³ 「發展日本新論」、7頁。

⁶⁴ 滿川认为，大部分北进者主张夺取满蒙后日本应向中国中南部发展，因此也将与美国发生冲突。滿川曉峰「南北進守の論争（中）」、『經濟時報』1914年6月号、16-17頁。

⁶⁵ 「南北進守の論争」、8頁。

⁶⁶ 同前、第9頁。

接兼并外国领土的主要原因，是与欧美列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之[吕宋岛]化为日本领有终究是美国所不欲见”。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为诸多同时期的国粹主义者所重视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对满川而言无足轻重。面对大战爆发后日本学界批判西洋文明的热潮，满川直言依赖日本的传统文艺不足以谈论现代文明。⁶⁸他对被文学青年奉为东洋精神之发扬的泰戈尔嗤之以鼻，质疑学界对孔子、王阳明等东亚传统思想家的重新关注“对日本文明来说究竟值得庆贺还是哀叹”。⁶⁹对他来说，一个民族的本质全由血统决定，为了向海外移动以求民族生存，“茶泡饭、和服和日本房”等传统生活方式并不值得留恋。这既体现了满川相比于大川周明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亚细亚主义者的逻辑差异，也清晰地反映了他对海外拓殖的执着狂热。通过海外拓殖维持以血缘定义的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满川的国家利益观的核心内容。后文将展示血统决定论的思考方式亦直接与满川对种族竞争的认识相联系，但在一战爆发前后他所关心的只有日本一国一族的生存。

然而，在血统决定论之外，满川的思考方式中还有着精神决定论的逻辑。⁷⁰血统决定了民族的一体性与边界，而国民的精神则决定了民族的力量与成就。面对海外拓殖中与欧美列强的可能冲突，如果“国民有刚健而志在有为的精神意志”便能克服任何抵抗。⁷¹正由于这种对力量来源的理解，满川对进入大正时代以来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思想变化深感不满，他认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国民失去了理想，从而削弱了“护国奉公的精神”。尝试提出凝聚全社会思想的国家目标是满川此后一生的课题，但不同于他十年之后将“亚细亚解放”作为日本的国家理想，1915年的满川认为“将日本扩充至世界，谋求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才是能统一日本国论的中心思想。⁷²

满川在1914年9月的时评《大战乱与将来的国际政局》中预测了战后国际局势的走向。他认为大战只会持续半年或一年，而协约国与同盟国的胜率是五五分。受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的立场影响，满川全心希望协约国最终获胜。但由于他未能预料到将左右整体战局的美国参战与俄国革命，他做出的局势预测与现实走向存在较大出入：德国或将瓦解，俄国将扩张至东欧与近东，获得出海口；另一方面，英国与法俄之间的摩擦将增加，落魄的德国将向美国求援，鼓动美国把日本逐出中国，最终美英德相互接近，美国或将成为国际政治的新

⁶⁷ 同前、8页。

⁶⁸ 晓峰生「矢來夜話」、『齒科新報』1914年12月号、51頁。

⁶⁹ 南溟庵主人「矢來臺より」、『經濟時報』1915年7月号、40頁。

⁷⁰ 但无论是血统决定论还是精神决定论演绎到极致都将沦为非理性的狂热（前者将成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后者易滑入不计后果的战争论）。事实上二者在满川的思考中都从属于现实利害计算。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⁷¹ 「南北進守の論争」、9頁。

⁷² 晓峰生「矢來夜話」、『齒科新報』1915年11月号、51頁。

中心；而日本的出路在于与俄国同盟。此处出现的日本最大的假想敌仍是美国。

在满川宣布放弃“亚洲门罗主义”的论文《敌乎友乎》中，他就已强调日俄结盟的必要性。需要关注的是满川在此时对于三国干涉的认识。他认为日本将俄国想当然地视作敌人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气量。⁷³在开战之时，满川同样反对将雪洗三国干涉之耻当做对德开战的缘由，一方面因为可能误伤盟友法俄，另一方面，“过去不得不屈于三国干涉的小日本，今日得以参加世界强国之大战，反而须向曾刺激日本的三国道谢”。⁷⁴在这一时期，三国干涉并没有如满川在后日所重复的那样，激起他对亚洲命运的关心和对欧洲列强的敌忾，他反而从日本一国的生存发展出发，力倡宽恕曾经的仇敌。

如上述分析所示，满川龟太郎在一战爆发前后毫无保留地展示出了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取向。在他的论述中，不见对亚洲民族的认同与关切，只有残酷的生存竞争、冰冷的进化铁则和强权的势力扩张。他为日本所描绘出的生存发展之路，乃是为获取拓殖地不择手段的独善其身，和通过与列强同盟维持国际均势。满川日后向亚细亚主义的回归隐藏了其追求日本利益的锋芒，但他冷彻的现实理性和界定国家利益的逻辑会一直存在于思想中。

三国干涉的激愤仍在满川心中沉睡，正如长谷川雄一所指出的，“认为三国干涉同满川国际关系认识与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直接相关有牵强之处”。⁷⁵满川只有经历整个一战及其所带来的世界变革之后，他才会赋予三国干涉以亚细亚主义的意义，这将留待下面两章的考察。在那之前，为全面把握处于亚细亚主义低谷期的满川的亚洲问题认识，下一节将简要讨论 1915 年中日关系上的大事“二十一条”交涉以及满川的评论。

第三节 “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对华认识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继承而来的满洲权益将于 1923 年到期，如何维持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困扰着日本政府，而一战爆发则带来了解决这桩“悬案”的好机会。日本决定参战后，日本政府便在加藤高明外相的牵头下开始了对华交涉的准备。由于军部与民间右翼等势力的压力，原旨在解决满洲问题的交涉草案最终膨胀为总数达二十一条的对华要求案。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包含中国政府聘用日本军事财政顾问、警察由中日合办等明显侵害中国主权的条款的第五号要求。中日交涉从 1915 年 1 月 18 日开始，其间袁世凯政府为抗衡日本，不断尝试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但最终仍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于 5 月 9 日接受了除第五号外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日本的满洲权益延长 99 年等。

在近 4 个月的中日交涉期间，日本国内各报刊对交涉动向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报道，其中

⁷³ 「敵か味方か」、8 頁。

⁷⁴ 「大戦亂と將來の國際政局」、18-19 頁。

⁷⁵ 长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117 頁。

大部分针对中国的反对及欧美媒体的非难进行回击，将交涉的不顺归咎于德国暗中煽动，呼吁袁世凯拿出诚意与日本合作，并随时间推移立场日趋强硬。满川担任编辑的杂志《大日本》也在 1915 年 3 月与 7 月各刊载了一篇关于中日交涉的社论，⁷⁶强硬立场赫然可见。其中 3 月号的《对支问题解决》虽承认日本过去的拙劣政策破坏了两国关系，但明言“若彼不觉大局，徒弄小策而荏苒送日，我国不可不执果断之处置努力使其觉醒”，对袁政府试图拖延时间争取外援的做法予以警告。⁷⁷7 月号的《让支那人进一步觉醒吧》则紧承《对支问题解决》的逻辑，不满于中国未能接受第五号要求，激烈指责中国人的顽迷和列强的煽动，进而表示“是使中国人真正畏惧我国、再也不轻侮日本吗？还是使其真正了解我国、亲密友善而不再背离日本吗？两者皆可”，⁷⁸威胁使用武力令中国服从日本。

上述两文似乎并非满川所作。⁷⁹在满川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涉及中国的仅有 1915 年 3 月的《喷火山上的袁大总统》和 6 月的《忙中闲》。有别于舆论界对中日交涉的热烈讨论，满川将笔墨集中在了袁世凯及其治下的中国之上。《喷火山上的袁大总统》首先回顾了袁世凯从外驻朝鲜破坏中日关系到镇压革命修改临时约法的一系列劣迹，进而揭露北京政府的“丑态”，指出袁世凯身边充满阿谀小人，一旦利益相背将干戈相向。满川尖锐地批判了袁世凯的“旧式政治”：“行旧式侦探政治，以猜疑之眼虞叛徒之出现，依然以权谋术数为内治之粹、以远交近攻为外交之妙，似不知四周状况与世界大势”，认为中国的四亿民众成了袁世凯野心的牺牲者。⁸⁰

满川继续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说支那既已于经济上为列强分割亦无可”，而政治分割也不远了；一旦袁世凯死去，中国将再度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让列强坐收渔利；而拯救中国的办法，则是“排斥权变外交之宿弊而巩固与日本之提携”，⁸¹在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中谋求中国自身的发展。⁸²他未明确提及“二十一条”交涉，但显然是在意识到中日交涉的背景下写下该文的。另一方面，考虑到 1915 年 2 至 3 月期间，日本社会并不知晓中日交涉的具体条款，也不能断定满川支持“二十一条”中露骨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

在上述对华评论中，满川仅从袁世凯一人入手评论中国时局，倾向于将中国当下内政外

⁷⁶ 杂志《大日本》每期开头有 1-3 篇社论，出自编辑局职员之手，均不署名。

⁷⁷ 「社説 对支問題」、『大日本』1915 年 3 月号、4 頁。

⁷⁸ 「社説 更に支那人をして覚らしめよ」、『大日本』1915 年 7 月号、6 頁。

⁷⁹ 《对支问题的解决》将日本人士煽动中国革命视为恶化中日关系的原因之一，这与满川同情辛亥革命的立场不符，更像是出自厌恶革命与共和政治的《大日本》社长川岛清治郎之手。

⁸⁰ 南溟庵主人「噴火山上の袁大總統」、『大日本』1915 年 3 月号、124 頁。

⁸¹ 同前、125 頁。

⁸² 此处对“中日提携”的提及会引出满川在 1913-1915 年间是否仍对中国复兴、亚洲连带抱有希望的问题。笔者认为，满川此处的呼吁是面向中国而非日本，暗示“中日提携”对中国来说是唯一的自救之途，但并不必然占据日本战略的中心。

交的弊端总结为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式政治”，这与他同一时期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形成了呼应。满川在 1915 年频繁发文批判日本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政治家的腐败，将日本的政界革新问题视作他这一年关切的重点也不为过。在 1914 年底解散议会后，日本的执政党立宪同志会为了在次年 3 月的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选举运动，为日本政治史上初见。政治家因党派所属反复改变立场、政党机关报的相互咒骂让满川深感厌恶，他将其斥为“从来泛滥的旧式”。⁸³满川期待着青年们让大隈重信等老人政治家退出政治舞台，廓清腐败的政界，实现“第二维新”。⁸⁴

满川在 6 月的随笔《忙中闲》中对中日交涉的评价也体现了他对日本国内政治问题的关心。该文对中日交涉的直接提及限于只言片语，很难以此全面把握他对“二十一条”要求的认识。他感慨“满蒙问题多少算是解决了”，⁸⁵对交涉中满蒙问题的处理不够满意，却也未作详细说明；但他进而指出满蒙地位的稳固将增强陆军增设师团的理由，希望陆军一次性提出增兵的总要求，而非拉长战线，让增设师团问题反复引起国内骚动——最终落脚到了防止国内政争上。同时他声称陆军增加兵力也是出于“一旦支那中原大乱之际以神速机敏出兵平定”的必要，⁸⁶强调了日本武力干涉的可能性。满川还将日本在交涉过程中以动员军队和最后通牒迫使中国让步视为“最拙劣的手段”，但这是由于他认为，为推行政策出兵撤兵将削减国民与政客对军队的尊重，而并非出自对中国的同情。满川出于相似的考量反对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他认为放弃军队流血攻下的青岛的做法，“虽然并非真将军队视为消耗品，也将对国民思想产生重大影响”。⁸⁷

不过，满川注意到在东京十几家报纸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中，只有《读卖新闻》一家与众不同，“而此种议论令一部分识者首肯亦是事实”⁸⁸。根据奈良冈聪智对“二十一条”交涉时期日本国内舆论的研究，5 月 9 日中日达成协议后，对日本政府让步的批判成为了媒体的主流意见，《东京朝日》《东京日日新闻》《时事新报》等主要报纸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政府的“屈辱外交”。⁸⁹满川有可能在区别于主流舆论的《读卖新闻》上看到了批判日本对华帝国主义政策的声音。⁹⁰而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呈现出优势，满川开始质疑日本当初对德宣战的决定，他在 1915 年 9 月的论文中提出，“本次对支交涉不顺，其原因在于对德战争”，⁹¹似

⁸³ 南溟庵主人「近時の政局と犬養木堂」、『大日本』1915 年 2 月号、82 頁。

⁸⁴ 矢来臺人「当世人物詮議」、『大日本』1915 年 6 月号、121 頁。

⁸⁵ 原文为“滿蒙問題が歪みなりにも片付いた…”。南溟庵主人「忙中閑」、『大日本』1915 年 6 月号、119 頁。

⁸⁶ 同前。

⁸⁷ 同前、120 頁。

⁸⁸ 同前。

⁸⁹ 奈良岡聰智『対華二十一条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年、248-249 頁。

⁹⁰ 如《读卖新闻》1915 年 5 月 12 日的《思慮不足の外交》一文主张，“二十一条”要求实际上侵犯了中国主权、引起了列强与中国的反感。「思慮の足らざる外交」、『読売新聞』、1915 年 5 月 12 日、3 頁。

⁹¹ 矢来臺人「当世人物詮議（世界の变局と石井新外相）」、『大日本』1915 年 9 月号、62 頁。

乎意识到了青岛问题在中日两国间产生的齟齬。

纵观满川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涉华言论，不难发现他仍对中国的前景充满悲观，并主张日本应该扩充军力准备干涉。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直接评论“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这也许与他这一时期将精力集中在日本国内政治上有关。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他眼中，中国和日本都面临政界革新的需要，而这种跨越国境的新旧政治势力对立构图，为他日后倾倒于北一辉的世界革命论打下了思想的基底。在《喷火山上的袁大总统》中，满川感慨中国革命势力已经四分五裂，革命党潜居于日本，孙文实现志向的日子将越来越远。⁹²但数月之后，也正是在与亡命日本的中国、印度革命志士的交往中，满川对亚洲命运的关切将被再次唤醒。

综上所述，尽管满川龟太郎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亚洲命运怀有关心，形成了亚细亚主义思想的雏形，但时局的变化却使他在1913年宣布放弃了无法与日本现实政策相结合的“亚洲门罗主义”。本章描述了1913至1915年满川亚细亚主义低谷期的思想样貌，分析了国家理性在满川身上的运作方式，认为随着满川专注于以帝国主义式的现实政治维护以人地关系定义的国家生存发展利益，他不再对亚洲予以同情的目光，而是将其视为自私的亡国民族的集合、日本海外拓殖的目的地与世界大国的角力场。在1915年的中日交涉期间，满川没有直接评论“二十一条”要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对袁世凯中国统治的批判与对日本国内政弊的抨击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联动，这也为满川在1916年再次对中国革命产生共鸣，并再次将视线投向亚洲大陆留下了机会。

⁹² 「噴火山上の袁大總統」、121頁。

第二章 亚细亚主义的回归及其边界：1916 至 1918 年

1915 年 12 月，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各派反袁力量以反对洪宪帝制为契机，掀起了倒袁护国运动。眼见中国再次陷入动乱，满川在 1916 年 2 月发表的《支那动乱的大势》中，一面对同床异梦的各派势力在成功倒袁后“支那大陆之形势果将如何”感到疑惑，担心中国“今真不得不受大流血之洗礼乎”；另一面则继续他对袁世凯的一贯批判，认为袁世凯应为中国现在的局势承担全部责任。他还提及了居留于旅顺的肃亲王，把这位倡言中日提携的前清皇族誉为“四亿人中鸡群之一鹤”、“支那中毛色殊异之一人”。⁹³

然而，在一个月后的另一篇涉华评论中，满川却对中日关系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他在 1916 年 3 月发表的《支那悲观乎乐观乎》中表示：“支那兴隆之策不兄事于日本终不可能者，支那青年知之；为救其于亡灭之域而信赖日本之必要，虽支那老人亦非不觉”，强调了中国民众亲近日本之情的普遍。他进一步提出，“若局限目光于六千万同胞之上，则支那印度皆仅是异邦之民；然若刮开巨眼放之于东亚大陆，足知于乌拉尔岭头、红海岸滨、白烟濛濛与黄尘相错之处更树百年之经纶乃急务也”，清楚地表露了将视野拓展到日本以外、关注亚洲大陆的连带志向。⁹⁴

满川论文的实际创作时间通常早于其发表时间十天到一个月不等，如《支那悲观乎乐观乎》的末尾就标明了成文时间“二月廿日”。⁹⁵由此推断，《支那动乱的大势》执笔于 1916 年 1 月，并很可能完成于 1 月上中旬。⁹⁶那么，为何在从 1916 年 1 月下旬到 2 月下旬之间满川的对华认识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为何他时隔数年再次显示了对亚洲的关切？本章将结合满川此时的经历阐释满川在 1916 年初的思想转向，梳理在复燃的兴亚理想和冷彻的国家理性的交融与对立中满川的亚细亚主义的内容和性质，凸显相比于 1913 年至 1915 年间满川从 1916 年至 1919 年初实现的智识发展与思想演进。

第一节 理解中国革命

理解满川 1916 年初的观点变化的关键，是他在同一时期密集获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新知识。与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的邂逅，同戴季陶、张继等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在时间上相互重合、效果上彼此叠加，令满川的对华认识在短时间内出现转折。

北一辉曾在华亲历辛亥革命的风暴与民国的肇始，1913 年宋教仁遇刺后，他被袁世凯

⁹³ 南溟庵主人「支那動乱の大勢」、『大日本』1916 年 2 月号、80-81 頁。

⁹⁴ 南溟庵主人「支那悲觀乎樂觀乎」、『大日本』1916 年 3 月号、50 頁。

⁹⁵ 同上。

⁹⁶ 杂志《大日本》每号于当月 1 日发行。

政府遣返日本。他从 1915 年 11 月 6 日开始起草《支那革命外史》，⁹⁷在写完第八章《南京政府崩溃的经过》后适逢在日中国革命人士为倒袁起事展开活动，便一时中断执笔，于 12 月将已完成的前半卷向日本各界名士发放，而满川所属的《大日本》社也在受赠之列。满川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得到《支那革命外史》的情境：“一天我到大日本社出勤，发现桌上放着一本包装粗糙、破破烂烂的印刷物。一边想着这是啥，一边把它拿在手上，顿时知道了作者送来了我渴望不已的《支那革命党与革命之支那》。”⁹⁸据他描述，由于川岛社长讨厌中国革命，他得以独占这本赠予公司的书。根据北一辉外赠的时间推断，满川获得并阅读《支那革命外史》前半卷的时间，大约是在 1915 年 12 月末至 2 月。到了他执笔《支那悲观乎乐观乎》时，虽然未直接引用《外史》，文章中受北影响的痕迹已十分清晰，连“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实物教训”这类次级论点也被忠实地反映了出来。⁹⁹

在截至第八章的《外史》前半部中，北一辉从中国革命的理想、革命党人的成长、革命运动的改观与南京政府的成立等方面介绍了中国革命，其中着重强调的观点是，中国革命的指导精神并非美国的民主共和，而是受日本思想影响产生的民族主义，中国革命是青年关心国族兴亡的结果。¹⁰⁰满川在《支那悲观乎乐观乎》中接受了这一观点：“支那之青年多学于日本，亲研我明治维新之成，彼等怀抱纯日本式思想归国，兴欲鞭策支那民族而振兴国家之志……故彼我之革命运动无外乎民族自觉之表现。”¹⁰¹他重新确认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存在。

为何满川会如此迅速地以北一辉的说法修正自己的观点？按照《三国干涉以后》中的叙事逻辑，满川对《外史》“渴望不已”是源自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以及自年少时起对北一辉的崇拜。但如前文所论，在 1913 年第二革命失败后至 1915 年期间，满川从未对中国革命表达过期待。在上述理由之外，满川倾倒在《外史》仍需要其他解释：中国战场上护国军捷报频传可能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北一辉在《外史》前半卷中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视为以袁世凯等“亡国阶级”和革命党人代表的“兴国阶级”之间的斗争，强调“古今革命皆少数年少书生之事业”。¹⁰²而满川对日中两国的“旧式政治”都深怀反感，期待日本青年掀起“第二维新”。北一辉的中国革命论或许正与满川对政界革新的关切产生了共鸣。此外，《外史》中的观点不仅因北一辉革命亲历者的身份显得可信，也被满川在同一时期与中国革命志士的

⁹⁷ 在 1915 年执笔之初，该书名为《支那革命党与革命之支那》。到 1916 年北一辉把全书赠予满川时将书名改为《支那革命党与日本外交革命》，对该书后半部分提出的日本外交构想予以强调。1921 年该书以《支那革命外史》的标题出版。本研究不关注各版本间的内容差异，对该书的提及一律以《支那革命外史》或《外史》代称，引用参考的是 1959 年版《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所收文本。北一辉次郎『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みすず書房、1972 年。

⁹⁸ 『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37 頁。

⁹⁹ 『北一輝著作集 第二卷』、26 頁；「支那悲觀乎樂觀乎」、50 頁。

¹⁰⁰ 『北一輝著作集 第二卷』、12 頁。

¹⁰¹ 「支那悲觀乎樂觀乎」、50 頁。

¹⁰² 『北一輝著作集 第二卷』、21 頁。

亲身交往所验证。

护国战争爆发前后，满川与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进行了频繁的来往。由于缺乏当时的记录，只能依据满川日后的回忆了解这些活动的实态。1916年1月19日¹⁰³，满川受张继与戴季陶的邀请，参加革命党人招待日本新闻界名士的聚会；据满川回忆，《都新闻》记者大谷诚夫代表日方人士在席上发表谢辞，其大意为感叹闻名于世的中国革命志士竟如此年轻，但同明治维新一样，革命永远是青年的事业。¹⁰⁴满川在《三国干涉以后》中感慨：“我从未像这个夜晚一样考虑通过与支那革命党的提携建设大亚细亚。”¹⁰⁵此前不久，满川在《大日本》社同事葛生东介的陪同下前往东京的戴季陶寓所拜访，戴季陶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日语流利，“宛若日本人”。¹⁰⁶此后满川又接连两三次前往戴宅交游，碰巧北一辉就住在离戴宅不远的地方，满川在与北相识后，常常一次顺道拜访两人。¹⁰⁷而在与中国革命志士聚会的“数日之后”，汉语教学机构善邻书院的院长宫岛大八告诉满川，张继在观看题为《南洲海舟江户开城》的戏剧后落泪，哀叹中国没有西乡隆盛与胜海舟一般的人物；满川听闻此事后，“更想支援支那革命党了”。¹⁰⁸

这些日后描述的经历是否真实反映了满川当时对华态度的全貌有待讨论，但上述三个发生在1916年初的片段被反复提及，则表明它们确实给满川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戴季陶、张继所代表的中国革命党，以“亲日”、“年轻”、“与明治维新志士相似”的形象存留在满川脑中，使他意识到，如北一辉在著作中主张的，中国存在衷心为国家命运担忧、并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情感和思想联系的志士，满川由此改变了对中国对日态度与民族自觉的总体评价。同时，在与中国革命志士的亲身接触中建立起的个人情感联系，化作“支援中国革命”、“建设亚细亚”的心情，重新唤起了满川对中国与整个亚洲命运的同情。

北一辉在1916年4月至5月期间，以更加激进的笔调写出了《外史》的后半卷。满川经由友人铃木诚作的介绍，在北闭关执笔期间登门拜访。满川忘记了当时的交谈内容，只记得“确实以非常的快意与崇敬谈论了国事”。¹⁰⁹完成《外史》全书的北于6月再赴中国，他在离开前赠予了满川自己亲笔修订的《外史》全卷。满川读完全书后，于1916年中秋记下

¹⁰³ 《三国干涉以后》标明本次聚会的时间为1916年1月19日晚，地点为东京芝区乌森町的湖月楼。但满川在1927年4月的回顾中又称这次聚会发生在东京芝区的红叶馆。由前后不一致的地点描述可推知，满川对时间的记忆同样不可尽信。根据他记录的会谈内容并参照局势发展，可推断聚会是在护国战争已取得一定成果的时期。『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第133頁；南溟庵主人「戴氏來朝を機として」、『東洋』1927年4月号、132-133頁。

¹⁰⁴ 《以戴氏来朝为契机》与《三国干涉以后》对大谷诚夫发言内容的记录有一些细微差别，但都强调了革命党人之“年轻”以及与明治维新志士的类比。

¹⁰⁵ 『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33頁。

¹⁰⁶ 同前。

¹⁰⁷ 「戴氏來朝を機として」、132頁。

¹⁰⁸ 『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34頁。

¹⁰⁹ 同前、140-141頁。

了自己经由《外史》受到的冲击：

“我未曾见过如此的‘天下第一书’，我多年为捕捉支那革命的实体而焦虑努力，终于得到了本书的若者¹¹⁰与他用鲜血之笔写成的本书，我能以何种言辞向皇天道谢啊！在著者于远方法衣仗剑寻找窝阔台汗之时，思念着著者、在祖国寻求同志、为亚细亚复兴的大业借其一臂之力，不就是我答谢的方法吗？”¹¹¹

依据这段读后感所述，满川此前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但始终为难以充分理解而困扰，这也许是他在此前两年间始终未直接表露对中国革命的关切的原因。满川清楚地意识到了《外史》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亚细亚复兴”的目标再一次被明确提出，并驱使着满川开始在日本国内寻找同志，其直接结果就是结成了作为老壮会前身的“三五会”。

从1916年起，满川对中国革命的评价带有了鲜明的北一辉的印记。除了对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解外，满川欣然接受了北描绘出的中国新旧势力对立的构图。他在1916年10月的论文《在外邦人的缺陷》中提出，“支那虽腐朽荒废，其不可济度者乃属于中世官僚阶级者也，大多数支那人历代为彼等沦为可怜之牺牲”，反对将革命党人士等同于“与上海埠头的车夫苦力相同”的北京官僚。¹¹²在1917年11月的评论《回顾的时代》中他又强调，若将革命党人怀抱的理想与段祺瑞等人的做法比较，很容易看出未来属于哪边。¹¹³正因为有了《外史》中区分亡国阶级与革命兴国阶级的逻辑，中国复兴与中日提携才在理论上具有了（哪怕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现实可能性。

在《外史》的后半部中，北一辉设想中国将在“窝阔台汗”的独裁领导下以武力实现统一，组建国民军队，没收官僚囤积的财富，并与日本结成如德奥一般的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和俄国。满川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借用北的概念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期待。他提出，“支那今日之急务乃财政革命及既成军队之解散，日支国防同盟之要实不可不在此”；¹¹⁴又在1917年8月的评论《日支兴废之机与我之积极政策》中明言，为了中国的和平与幸福，中国的统一政府最开始必须实行极端的专制政治。¹¹⁵这些主张忠实地反映了《外史》后半部对“革命独裁”的强调。在《日支兴废之机与我之积极政策》中，满川呼吁日本以“积极政策”援助南方革命党人完成护法运动，推动新兴中国的建设。

然而，在这些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认识之外，北一辉的《外史》给予满川的影响中，更重

¹¹⁰ 福家崇洋书中引文如此，疑为“著者”之误，可能是原文笔误或引用者的疏漏。

¹¹¹ 北一辉次郎『支那革命外史と日本外交革命』，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室藏「満川亀太郎関係資料」，H02，卷末跋语。转引自福家崇洋，102页。

¹¹² 南溟庵主人「在外邦人の缺陷」、『经济时报』1916年9月号、19页。

¹¹³ 満川龜太郎「回顧の時代」、『经济时报』1917年11月号、39页。

¹¹⁴ 「在外邦人の缺陷」、19页。

¹¹⁵ 満川龜太郎「日支興廢の機と我積極政策」、『大日本』1917年8月号。文本参考 満川龜太郎『奪はれたる亜細亞』広文堂書店、1921年、15页。

要的是对中国新兴民族主义的尊重和理解。北一辉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正是民族意识觉醒的证明，呼吁日本人尊重中国民族情绪的敏感脆弱：“彼等青年敏感于国家之荣辱，开活眼于国权之得丧……惯于凌迫亡国阶级之日本即便欲以因循的轻侮观与之亲善，彼等也过于爱国了”，¹¹⁶强调与爱国的革命者交往决不能怀有凌迫轻侮之意。他在《外史》中嘲讽日本的中国悲观论者有如“以德川时代的日本观类推日本之亡国的外国人”。¹¹⁷这种基于日本屈辱记忆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也体现在了满川笔下：五十年前欧美人将日本人视作亡国之民，但谁能料到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经过如斯悲愤与屈辱，终于赢得一等独立国之体面者，为何急欲将其苦痛与屈辱转移至邻邦可怜之国民呢”，¹¹⁸在深表同情之余对日本的行为予以反思。

这种对中国乃至其他亚洲民族的感同身受难能可贵，但其界限亦清晰可见。满川所批判的日本加之于亚洲民族的“苦痛和屈辱”，具体所指的是日本人“以一等国国民自任的虚荣”，将亚洲民族诟骂为劣等民族的傲慢不逊，以及“贱买贵卖、沉湎酒色、贪婪无厌”等个人伦理层次的问题，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反省也只停留在“占取中国既麻烦又不合理”的程度，对于直接引发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利权扩张却只字未提。¹¹⁹事实上，在1916年9月的《在外邦人的缺陷》中，满川仍未排除日本吞并东亚的可能性，提出如果不改变日本人的傲慢态度，“即便将来有（中日）两国合并的一天，其统治也将远比英国统治爱尔兰更困难”，东南亚民族也不会“想脱离外国的羁绊成为旭日旗下的和平之民”。¹²⁰

由此可见，北一辉在《外史》中高呼“亚洲门罗主义的正义”与日本作为亚细亚盟主的责任，沉睡于满川龟太郎心底的亚细亚主义理想随之重新燃起，但他冷酷现实主义者的一面并未消失。这既让他的中国评价充满波动与张力，却也促使他将目光继续西移，为他最终以另一条路径到达亚细亚主义埋下了伏笔。

第二节 中日国防同盟与国防线的南移

满川基本接受了《外史》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但却对北提倡的“外交革命”不置可否。满川重视亲历中国革命的北带回的一手信息，但他作为敏锐把握着国际动态的时评作家，对于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保持着独自的意见。对于北在《外史》中提出的日本与德国结盟、废除日英同盟的构想，满川始终反应冷淡。满川对在战争上展现出韧性的德国暗怀敬佩，但

¹¹⁶ 〔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28页。

¹¹⁷ 〔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37页。

¹¹⁸ 〔在外邦人の缺陷〕、19页。

¹¹⁹ 对日本利权扩张反省的阙如也体现在北一辉的《外史》中。北所批判的只是日本一味追随英国，参与对华经济侵略和领土分割的行为，对于日本在满洲保有权益毋宁是赞同的。

¹²⁰ 〔在外邦人の缺陷〕、19页。

即使如此仍强调“(赞扬德国的思想)是日德战争的意旨尚未在国民中贯彻的表现”——与北一辉式的激进理想相比,战争状态中现有的权责利害关系更加重要。¹²¹另一方面,与北始终将俄国作为中日之大敌、视美国为潜在合作者正相反,满川则对俄国抱有好感、而认为日美终将在太平洋上发生冲突。

但即便是《外史》给满川带来的对中国革命的乐观情绪,也常随中国局势的变化而动摇。满川往往在南方革命党人起事并取得成果时高声呼吁支援中国革命,而在南北妥协或革命陷入困境时展现出冷漠的一面。¹²² 满川以较为严厉的眼光注视着革命处于低潮的中国,认为中国终究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维持独立,“必将被诱致有势力的一方”。¹²³正如1913年时满川经历的“脱亚”转向已显示的,面对现实局势走马灯式的变换,满川很难对缺乏具体性的兴亚理想保持忠实,冷彻的国家理性自然而然地再占上风。

然而,在1916年以后,满川没有重回1913年《敌乎友乎》中的中国分割论,而是坚持了以中日国防同盟保全中国领土的观点。满川将日本所应提倡的中国保全论与欧美一直鼓吹的中国保全论区分开来,认为欧美只是为了牵制他国而鼓吹保全中国,而一旦自己有机可乘时则绝口不提,¹²⁴日本的中国保全论则意味着“若列国轻侮我武力之无为,进犯南方支那之一角,帝国不可不以日支共存之实力排除之”。¹²⁵而关于日本保全中国的原因,满川在写于护法战争兴起时的《日支兴废之机与我之积极政策》中采用了“东洋盟主的天职”等理想色彩浓厚的提法;而在出版于1918年6月的著作《列强领土及经济上的发展》中,满川则展示了深层的现实考量:“支那分割乃诱致欧洲之强势于眼前者。假令我国获得一部之形胜,而为此接踵而至的外交上之大难关与人种上之大困难,竟将使国础危殆不已。”¹²⁶强调中国的分裂会导致东亚的均势遭到破坏,割得中国领土、在东亚站稳脚跟的欧美势力将直接使日本陷入“裸体的国防”。¹²⁷同时,大战为日本政军界带来的“总力战”思想也使满川意识到,

¹²¹ 「忙中閑」、119頁。

¹²² 仅以第一次护法战争时期为例便足以看出满川涉华评论基调随时局推移而波动的轨迹。在1917年6月府院之争正酣、中国饥荒肆虐的时节写就的《支那の凶兆と帝国の準備》中,满川提到,“最近三回の革命動亂更多生災民……中央政府之基礎常動搖,而政令不行”,隱隱批評革命加劇了中國的混亂。(「社説 支那の凶兆と帝国の準備」、『大日本』1917年7月号。因被满川收入文集《被夺走的亚细亚》可知出自满川之手。文本参考『奪はれたる亜細亜』,427-428頁。)而在7月孙文开始召集护法运动后,满川在《日支兴废之机与我之积极政策》中一转而呼吁日本支援中国革命;在护法军高歌猛进的10至11月,满川更是在《回顾的时代》中称“没有比提倡支那南北妥协的论者更对支那缺乏理解的人”。(「回顧の時代」、39頁。)然而,当护法战争以南军的分裂而告终后,满川眼中的中国又沦入了“走错一步就将濒临列国共同管理之危机”的形势。(滿川龜太郎「亜細亜に於ける英独争覇戦」、『大日本』1918年3月号。文本参考『奪はれたる亜細亜』,76頁。)

¹²³ 猶存樓客「提携の意義自ら瞭か也」、『大日本』1917年3月号、51頁。

¹²⁴ 滿川龜太郎「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廣文堂書店、1918年、283頁。

¹²⁵ 「日支興廢の機と我積極政策」、『奪はれたる亜細亜』,22頁。

¹²⁶ 滿川龜太郎「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283頁。

¹²⁷ 「日支興廢の機と我積極政策」、『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9頁。

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只有通过“日本的战争能力与中国的战争资源之协同”，¹²⁸才有能力参加大规模持久战，他甚至直言日中提携的目标正在于此。

至1917年，对于满川而言，回归亚洲已成为现实政治的必要，是日本为了应对欧美必须采取的策略：因为日本需要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缓冲地带，所以日本须维持中国独立；因为日本需要大量自然资源以进行战争，所以必须促使中国与日本携手。1916年11月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出版后，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讨论亚细亚主义的热潮。杂志《大日本》在1917年7月号上开辟了专栏“亚洲门罗主义的阐明”，登载了各界名士对亚细亚主义的理解。满川针对专题中认为亚细亚主义将连累日本的观点，发表了论文《作为国防之结论的亚细亚主义》进行回击，主张亚细亚主义不是白替印度人波斯人做打手，“实际上，鉴于目下之形势，吾人无暇为他人提倡亚洲门罗主义，吾人反而为了帝国自身而不得不倡导之。”¹²⁹

而防止中国分割、保障日本安全的急迫感，来自于满川在1916年后对大战中世界形势走向的再认识。前文曾提及当1915年后半协约国在欧洲战场上陷入劣势时，满川质疑了日本对德开战的决定，并开始关注德国的力量来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沉溺于德国研究”。¹³⁰但欧洲以外的战场上的战况又让他开始关注英国的世界政策。至1917年底，除德属东非的一隅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都已被英法占领；英军1917年3月攻占了巴格达，并继续从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两方面进军，与反叛的阿拉伯人相配合，控制了土耳其帝国的东南部。与此同时，俄国因革命陷入内乱，对英属印度的威胁一时大大减轻。在世界局势的推移中，满川逐渐注意到，英国是世界大战的受益者，通过在非洲和近东战场的优势地位，英国得以推进用铁路将开普敦、开罗、加尔各答连成一起的“3C政策”，筑成跨亚非二洲的世界帝国。¹³¹

满川意识到，如果英国把从开罗到印度、缅甸、再到中国滇藏的铁路连成一线，将拥有在短时间里在东亚大量增兵的运输能力，配合其海上霸权，从南方对中国与日本造成安全威胁。他由此得出结论，日本国防的重心今后将从满蒙南移至华中华南区域，“俄国从北方的压迫显著缓和之同时，中南方面与英德美法诸国之折冲似将渐多”。¹³²由此，与中国南方合作成为了燃眉之急。满川在此处强调的支援南方革命党的理由，并非《外史》所主张的兴国阶级的资质，而是预防列强从南方来袭的地缘政治考量。

在对欧美列强的警惕之中，满川一面反思日本对华的傲慢态度，认为留学生教育机构的不健全、日本人“恃强凌弱的卑劣根性”使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多产生反日情绪，¹³³但另

¹²⁸ 「提携の意義自ら瞭か也」、51頁。

¹²⁹ 猶存樓客「国防的結論としての亜細亜主義」、『大日本』1917年7月号、101頁。

¹³⁰ 曉峰生「十燭燈下」、『经济时报』1916年5月、39頁。

¹³¹ 滿川龜太郎「亜細亜海岸鉄道」、『大日本』1918年2月号、27頁。

¹³² 「日支興廢の機と我積極政策」、『奪はれたる亜細亜』、22頁。

¹³³ 滿川龜太郎「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286-287頁。

一面开始更多地将中日间的摩擦归因于英美的煽动。他隐晦地攻击，“当追根问底在中国采取所有手段排日的实际上是何国国民时，愕然而不能不觉败兴”。¹³⁴能让满川因对方反日感到惊讶与“败兴”、却又不明言的，恐怕只有与日本结盟的英国了。他认为，英法怂恿中国参战，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日本的势力增强，而希望将中国引入和会与日本作对。¹³⁵

尽管现实发展使满川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时常动摇，但对现实政治需要的判断同样使满川坚信日本未来“唯一的活路”就在于中国，¹³⁶这迫使他严肃地思考改善日中关系的途径。在直视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他终于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的利权掠夺与中国对日感情的恶化直接相关，进而提出“日本须抛弃短视的利权获得、一时的糊涂政策，披沥真正深入支那四亿民众内心之诚意”。¹³⁷不同于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反对归还青岛的立场，满川在1917年3月的论文中主张“苟欲确立日支提携之大本，日本岂可学狡猿固守熟柿之丑态邪”，¹³⁸提出放弃对德山东权益的继承，消除中国的对日不信感。¹³⁹这标志着满川对华政策提案的实质性变化之一，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说明日本应该归还的是哪些利权（除了青岛之外），也没有构想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归还契机，更未说明将利权归还给中国是否附着条件，这意味着他的表态仍存在较大阐释空间。但满川始终相信中国终将认识到中日两国在对抗欧美方面的利益一致，日本使中国敬服的根本手段是建设足以抗衡西洋的军事力量，“只有将失去山东的德国与亚洲大陆隔开，才能与中国互表敬意”。¹⁴⁰

在西力从南方东渐的危机感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满川从现实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了以日中提携为内核的亚细亚主义的必要性。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的韧性与中日国防合作的紧迫感推动着满川进一步反思日本国家的行为。对西力东渐的关注诱使他开始关注中国以西的地域，最终将视界扩展到整个亚洲。

第三节 “着眼于中亚与印度吧！”

1917年10月，驻埃及英军攻向西奈半岛与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叛军呼应，席卷土耳其帝国南部。11月，满川在黑龙会主办的杂志《亚细亚时论》上发表论文《国际政局的新中心

¹³⁴ 「時論 国防線の推移と南方亜細亜」、40頁。

¹³⁵ 「亜細亜に於ける英独争覇戦」『奪はれたる亜細亜』、75頁。

¹³⁶ 「時論 国防線の推移と南方亜細亜」、40頁。

¹³⁷ 滿川龜太郎『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284頁。

¹³⁸ 「提携の意義自ら瞭か也」、52頁。

¹³⁹ 然而，满川始终坚持山东的地位必须“由日本的自主外交决定”，认为日本有处分青岛问题的正当性，与其说归还青岛是对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原则的遵守，不如说是出于在西力东渐的危机下改善日中关系的紧迫感。此外，若从建设缓冲地带和支持“总力战”的角度出发，除了通过放弃利权以改善中日关系之外，吞并或控制中国同样是符合逻辑的，是什么让满川选择前者？如《在外邦人的缺陷》中已显示的，他意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使日本的外来统治极为困难，不具有现实性。

¹⁴⁰ 「提携の意義自ら瞭か也」、52頁。

——着眼于中亚与印度吧），感慨作为西力东渐之闸门的土耳其一旦崩溃，“狂澜怒涛将吞没亚细亚大陆之全面，帕米尔的高原与喜马拉雅的连山，恐都不再重要”，¹⁴¹预测欧洲列强向东扩张的势头将更加凶猛。如此局势使关心中国保全与日本国防的满川意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只埋头于中国本身，“支那问题不能不由列强之政策而作打算……由西而来之势力必将经由中亚及印度”。¹⁴²填充于巴尔干与中国之间的中亚与印度在满川眼中，成为了日本急需研究的课题。

在这篇论文中，满川回顾了日本人和欧美人关于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与现存研究文献，并列出了该地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出的研究题目中既包括英国的“3C政策”、德国的中欧纵断政策等帝国主义政策问题，也有印度革命问题、印度自治前景问题、俄领中亚民族问题、泛伊斯兰运动的前途、犹太人问题与埃及民族运动等话题，足见满川此时已经开始关注亚非民族的斗争运动了。对这些题目的研究与评论占据了他此后两年间发表的论文的主要部分。

满川对于印度民族运动的关心，早在1908年的《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中就已显现。但他发表关于印度的专题论文，系统地介绍分析印度问题，则始于1917年。满川作于1917年5月的论文《印度的不穩及其将来》较全面地反映了他此时对印度的认识。文章从大战爆发后印度发生的数起暴乱事件切入，认为印度的局势并没有人们风说的那么混乱，但也不像英国官员声称的那么稳定。满川指出暴乱的背后有着印度的民族觉醒，“其由日俄战争所刺激之民族思想，更依今次大战而澎湃勃兴”；¹⁴³再加上印度人在大战中对宗主国的莫大贡献，满川认为，无论印度在战后将走向自治还是独立，都“断非甘于现状者也”。¹⁴⁴

他追溯了印度民族主义的起因与理想，认为是英国的印度统治唤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感。《印度的不穩及其将来》描述了英国在印度的横征暴敛、司法不公、警察腐败、商品倾销以及印度青年在帝国体制内的晋升困境，走投无路的青年们重新燃起对印度辉煌历史的憧憬，大多投身于独立运动。满川进而具体介绍了印度自治运动与独立运动的发展史，和英印政府的粗暴应对，指出如果印度知识分子与英国同情者争取印度自治的努力遭到抑压，“难保无使温柔之猫至成凶猛之虎的危险”，革命与独立运动将获得势头。¹⁴⁵

正如他经由认识中国革命党人和阅读《支那革命外史》取得了对中国的新理解，满川关于印度的新知，同样是从与印度流亡志士的交往经历和大川周明的印度研究中获得的。1916

¹⁴¹ 満川亀太郎「時論 國際政局の新局面 中亜と印度とに着眼せよ」、『亜細亞時論』1917年11月号、59頁。

¹⁴² 同前、51頁。

¹⁴³ 「印度の不穩と其将来（大正六年五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亞』、175頁。

¹⁴⁴ 同前、177頁。

¹⁴⁵ 同前、182頁。

年春，满川在早稻田时代的同学宫川一贯家与印度独立运动家拉什·伯诃利·博塞（Rash Behari Bose）相识。此前不久，流亡日本的博塞一度接到日本政府的离境命令，最终在头山满等民间势力的协助下躲过巡警留在了日本。据满川回忆，他初次见到博塞时两人用零碎的英语进行了交流。博塞向满川提及，大川周明正埋头于印度革命运动的研究，这是满川首次听闻大川之名。而大川当时所进行的创作，就是在1916年秘密出版的《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¹⁴⁶

此前不久，满川与何盛三、宫川一贯等友人创办了时事研讨会。这个被称为老壮会前身的“三五会”从1916年至1917年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川周明和精通中亚知识的长濑凤辅在成员名单之中，¹⁴⁷博塞也常在层层隐匿下前去参会。¹⁴⁸“三五会”没有留下讨论记录，但可以推知它充当了满川与中亚与印度研究专家交流、获取相关地域知识的渠道之一。大川的《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为满川提供了具体细致的印度信息，满川《印度的不穩及其将来》一文的结构明显受到了大川著作的影响；他评估印度局势时，原文引用了大川在书中对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言论的概括，¹⁴⁹关于英国治下印度人民所受苦难的记载也参考了大川的描述。

1917年8月，杂志《经济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某亚细亚人稿、南溟庵主人译”的文章《日本的地位与亚细亚问题》，译者是使用笔名的满川。在该文中，这名“亚细亚人”提到日俄战争给予了亚洲民族以莫大的精神鼓舞，主张日韩合并是保障两国安全的唯一手段，认为中国正被白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¹⁵⁰以疑似日本人的口吻竭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但既然文字需要翻译，那么作者便并非日本人，很有可能是博塞等交集于满川身边的印度流亡人士。与这位“亚细亚人”的观点相同，满川在《印度的不穩及其将来》中也首次提及他将在日后反复强调的“日俄战争的世界史意义”——刺激亚洲各国觉醒。满川或许正是经由与博塞等亚洲流亡志士的交往，在他们的视线中，才切身感受到了日本所肩负的沉重期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满川对印度民族运动抱有关心，他对印度前景的判断仍和“某亚细亚人”的期待与大川周明的印度论存在明显的温度差。他在《印度的不穩及其将来》的末尾展示了自己冷彻的预判：在英国海军航行于东亚海域，而中国复兴的希望不定的背景下，

¹⁴⁶ 『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30頁。

¹⁴⁷ 満川生「老壯会の過去と現在」、『雄叫び』第一号、1920年7月。转引自 福家崇洋『満川亀太郎：慷慨の志猶存す』、98頁。

¹⁴⁸ 『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131頁。

¹⁴⁹ “最近在印度的不穩，乃基于德国唆使及少数革命党煽动之人为现象”。这句话是大川著作中对张伯伦一系列言论的总结，而满川在论文中将其作为张伯伦的原话直接引用了。见大川周明『印度に於ける国民的運動の現状及び其の由来』、大正五年十一月代誊写、10頁；『印度の不穩と其将来』、『奪はれたる亜細亞』、173頁。

¹⁵⁰ 某亞細亞人稿、南溟庵主人訳、「日本の地位と亞細亞問題」、『经济时报』1917年8月号、20頁。

“印度人应努力于自治，亚细亚主义之实现一时将无限延期矣”，¹⁵¹反对为了亚细亚主义理想直接与英国对抗。大川在《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中强调，印度的动乱“绝非德国或一部分革命党煽起的人为现象”，而是英国印度统治之缺陷的结果。¹⁵²满川却主张印度的不稳“明白地并非纯粹之内乱”，关注德国在幕后的操纵。¹⁵³

在1917年9月发表的论文《印度问题的归就》中，满川更是直言不讳地挑明，日本只在日英同盟与对外贸易这两重意义上与印度相关，“只要日英同盟存续，印度一朝受袭于外敌或内乱蜂起之场合，我国有不可不采取必要措置之责任，出兵与友邦共面强敌或镇定其内乱”¹⁵⁴，展现了重视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义务先于亚细亚主义理想的姿态。¹⁵⁵正是在对印度及中西亚地区的态度上，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心情与实际政策提案呈现了最清晰的分离。他尽管与流亡日本的印度革命运动家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却决不愿意触碰日英同盟的红线；满川对协约国叫嚣“把土耳其驱逐回亚洲”表示愤怒，祈祷土耳其的复兴，¹⁵⁶但却清楚地明白不可能对站在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土耳其进行任何实质援助。正如上文已多次展示的，当现实利益权衡与兴亚理想在满川身上发生冲突时，后者必将让位于前者。

在满川眼中，印度周边“若非贪于堕眠者，则仅英化已了之民族”：波斯、阿富汗乃至缅甸缺乏民族自觉意识，印度独立运动也因缺乏同盟力量不具有现实性。¹⁵⁷从1917年至1919年初，中西亚地区频繁地出现在满川笔下。但他所关注的，只是作为英俄或英德世界政策竞争前线的中西亚——巴格达是德国东方政策与英国亚洲海岸铁路的要冲，波斯湾是重要的石油产地与拓殖目的地，阿富汗是历史上侵入印度的必经之路——即地理意义上的中西亚，而非作为行动主体的中西亚。¹⁵⁸满川还对非洲和中南半岛进行了研究，但这些地域研究的落脚点仍是列强的政策动态，他在《亚非利加纵贯铁道》中详细梳理了欧洲列强在非洲的筑路计划与殖民地争夺史，¹⁵⁹在《南方亚细亚的一角》中指出研究东南亚的重要性在于其“将成未来国际政局必争之要点”。¹⁶⁰

对满川而言，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仍是大国强权间的竞争，小国弱国无法成为国际关系

¹⁵¹ 「印度の不穏と其将来」、『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86頁。

¹⁵² 『印度に於ける国民的運動の現状及び其の由来』、15頁。

¹⁵³ 「印度問題の帰就」、『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93頁。

¹⁵⁴ 満川亀太郎「印度問題の帰就」、『大日本』1917年9月号。参考『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88頁。

¹⁵⁵ 与《印度的不稳及其将来》相比，满川在《印度问题的归就》中对印度的同情明显减弱了，这可能与他看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年4月27日的承诺、坚信战后印度必将获得自治权的判断有关。他认为除了少部分革命派，大多数印度人都会满足于自治。同前、202-203頁。

¹⁵⁶ 満川亀太郎「亜細亜の西門」、『亜細亜時論』1918年6月号、57頁。

¹⁵⁷ 「印度問題の帰就」、『奪はれたる亜細亜』、204頁。

¹⁵⁸ 参見「亜細亜海岸鉄道」、及『奪はれたる亜細亜』所收录「波斯湾の復古的形勢（大正七年二月）」和「印度の西北境上（大正七年五月）」。

¹⁵⁹ 参見『奪はれたる亜細亜』所收录「阿弗利加縦貫鉄道（大正七年九月）」。

¹⁶⁰ 満川亀太郎「時論 南方亜細亜の一角」、『亜細亜時論』1918年6月号。参考『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18頁。

的独立变量，其兴衰仅是“强国竞争之涡中生出的泡沫式的现象”¹⁶¹——波兰与阿拉伯的独立并非国民自主精神的流露，使波斯湾“重现古时辉煌文明”的是德国的巴格达铁路，波斯废除所有与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受德国操纵的结果。在满川的此时的思考中，亚非弱小民族的主体性是缺位的。

综上所述，在 1916 至 1918 年间，满川对亚洲复兴与中国革命的热情被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重新唤醒。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满川为了日本的安全而重视中国的保全、提出“日支共存”，又为了中国的保全而关注位于西力东渐路径上的印度与中亚，最终将视野扩展到了包括非洲与东南亚的全体亚非地区。然而在这幅亚洲构图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日本与中国，满川只关于中国提出了相对具体的连带方案，对他而言，日本仅对中国负有保全其领土、援助其革命并助其建成强国的义务，如果“中国保全”遭到列强的破坏，日本“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¹⁶²从 1916 年起，日本社会出现了铺天盖地的中日提携构想，与这些构想相比，满川的中日连带方案除了坚定地支持南方革命派以外，并无突出特色，在体系化与具体化程度上也逊色于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满川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日本的行为持续进行着自省，他甚至为了消除中日两国的不和，一度提出放弃在华利权。当然，纵使满川可以保证自己对中国的同情纯粹真实，谁也无法保证由日本政府与军部主导的支援中国革命或“保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会成为新一波侵夺在华权益浪潮的开端，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军队从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便已侵犯中国的主权。¹⁶³

另一方面，满川虽主要以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中西亚与印度，却也并非未将这些地区纳入亚细亚主义的框架中。他所提出的涵盖整个亚洲的亚细亚主义议程，是“日本的文明使命”。他在 1917 年 1 月的论文《论自主的日本国民》中主张，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促进蒙昧未开的亚洲民族的文明进步。¹⁶⁴在 1919 年初的论文《我国国民的驯化性与亚细亚开发之使命》中，满川提出，既然日本欲以亚细亚主义立国，就不能忘记亚洲的开发，因此须作为“亚洲长兄”向中西亚移民并开发此处的资源；¹⁶⁵在开采过程中输出的资本与技术将促进当地的文

¹⁶¹ 南溟庵主人「自主の日本國民論」、『经济时报』1917年1月号、8頁。

¹⁶² 滿川龜太郎「列強の領土の並經濟的發展」、285頁。

¹⁶³ 日本寺内正毅内閣 1918 年在威逼利诱之下迫使中国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中日联合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也是中日关系史上唯一一次正式的军事同盟。日本支持北洋军阀政府明显与满川的希望相悖，但由于满川不曾在时评论文中对该协定有过任何评论，无法判断他的立场。只能据他 1919 年 3 月 10 日的日记证明他确实关心中日军事协定。「行余日誌」、『滿川龜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3頁。

¹⁶⁴ 「自主の日本國民論」、10頁。

¹⁶⁵ 滿川龜太郎「時論 我國民の馴化性と亞細亞開發の使命」、『亞細亞時論』1919年1月号。参考『奪はれたる亞細亞』、37頁。

明进步。¹⁶⁶在此处，亚细亚主义的话语与日本解决人地矛盾的“国是”结合起来，起到了为海外拓殖正当化的作用。满川一直对英国的埃及前总督克罗默伯爵无比崇敬，他曾多次在文章中引用克罗默的著作《古今的帝国主义》中的观点，¹⁶⁷并将克罗默誉为埃及历史上两位伟人之一，强调英国为埃及的财政、水利、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¹⁶⁸不论满川是否真心认为日本的殖民移民将为中西亚地区带来的贡献多于可能的伤害，他都无疑已经把以文明开化之名自我崇拜的殖民者逻辑内化于心了。

总之，满川认为，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除文明开化以外的亚细亚主义议程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在履行“文明开化的使命”时往往也须注重与列强的国际协调——日本对印度的政策须以日英同盟为基础，日本开发中西亚也应经由“同该地区拥有密切关系的英国的完全的协调”¹⁶⁹。这与他设想的对华政策形成对照。截至1919年初，满川已经形成了以日中军事同盟保障两国安全为主轴，以开发亚洲资源促进亚洲文明开化为延展的亚细亚主义构想，在将重点置于东亚的同时，在广度上囊括了整个亚洲。在思考亚洲问题时，尽管满川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寄予了真诚的同情，但支撑其亚细亚主义的动机却是对日本的国防安全、人地矛盾与资源获取的考量，亚细亚主义心情始终并非塑造他亚洲政策构想的决定因素。

¹⁶⁶ 与满川关系亲密的海军中将上泉德弥在1918年6月出版的著作《大日本主义》中提出了此观点，满川在1918年7月的书评中表示赞同；在1919年5月的论文《列强海外投资策的研究》中满川也提到了海外开发与传播文明的联系。晓峰生「矢來臺より」、『经济时报』1918年7月号、40頁；南溟庵主人「列強海外投資策の研究」、『经济时报』1919年5月号、16頁。

¹⁶⁷ 例如「自主的日本國民論」（1917年1月），「全獨逸主義の研究(上)」（1917年6月），「印度問題の帰就」（1917年9月）。

¹⁶⁸ 满川龟太郎「埃及国民運動」、『大日本』1919年4月号。参见『奪はれたる亜細亞』、391頁。

¹⁶⁹ 「時論 我國民の馴化性と亜細亞開發の使命」、『奪はれたる亜細亞』、38頁。

第三章 通往“亚细亚解放”的路途：1919 年及以后

1918 年秋天，日本迎来了国内外局势的激变。由通货膨胀和供应不足带来的米价腾贵在 8 月引发了大规模群众暴动，寺内内阁在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后引咎辞职。这场“米骚动”的余波持续到 10 月，将伴随日本资本主义急速发展而产生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暴露无疑，最终带来了近代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的上台。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德国正被协约国的“百日攻势”步步紧逼，并在国内的革命风波中于 11 月宣布停战投降，持续了四年多的大战落下帷幕，战后的国际秩序将由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决定。

满川在局势的变化中看到是“内外皆已途穷”的日本。他为了寻找打开困局的对策，在 1918 年 10 月创立了老壮会，聚集从左到右的各色人士展开时局研究；并在次年 8 月以老壮会的核心成员为基础成立了犹存社，踏出了“国家改造”的第一步，提出了“亚洲解放”的目标。本章将在梳理满川对一战后世界形势的把握的基础上，考察战后日英美帝国竞争的格局、亚非民族主义的抬头如何引导满川最终超越其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原有边界，探析其“亚细亚解放”口号的具体内容与性质。

第一节 “内外皆已途穷”

在 1918 年 10 月 9 日的老壮会第一次聚会上，满川作为发起人发表了欢迎辞，阐明了创立该会的原因与目标：

“今我国内外皆途穷，际会非常之重大时期，转一步则将至亡国。国际上，战局愈呈德国之败形，英美之势力将于东洋益增，支那问题、西伯利亚问题将变得尤为困难。思想上，民主倾向成世界急潮，将如何与我国冲突，又应如何应对，可谓三千年来首次经历也。社会上，贫富悬殊，阶级战争之大波将涌来……生活上，物价腾贵（物资）不足虽在今日广受议论，但归根结底是人口与领土之问题，这又回到最初的国际问题上……关键在于，就如何确定本国应立之所，群集众智以进行研究。”¹⁷⁰

他的发言从国际环境、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总结了大战结束时日本面对的困境，流露了强烈的危机感。

潜伏在日本国内的危险，是粮食不足、物价上升导致的生活困难和阶级斗争。米骚动将粮食问题彻底暴露了出来，而这场蔓延全国、使“大阪全市几近毁灭状态”的大规模暴动更让满川看到了俄国革命重演的危机。他从俄国革命的经历中得出教训，革命将带来三大灾难：第一是皇室倾覆，国家失去“中心”；第二是革命的恐怖将使民众难以维持生活；三是招致

¹⁷⁰ 满川龟太郎「老壮会の記」、『大日本』1919 年 4 月号、102 頁。

外国干涉。满川构想的应对方法，是日本志士利用革命混乱之机实现“第二维新”，用以天皇为中心的“锦旗革命”代替“红旗革命”，提出了以政变完成日本政界革新的设想，犹存社也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创立的。¹⁷¹

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困境，则是在战争中得到发展的英美势力将重回东亚，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对满川来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大战期间，正是日本支援中国革命、革命党人统一并改造中国、日中缔结国防同盟的好时机。然而大战终结，中国的混乱分裂依旧。满川在1919年1月感叹，日本唯一的同伴中国“大机既逸，吾人不得不疑其非将沦为‘国际的支那’乎”，认为由于中国未能抓住大战的机遇，将在战后的新一轮分割下丧失独立。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迎合英美引支那参战”，巴黎和会上日中围绕青岛问题产生激烈对立，使日本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通过与中国连带以缓解日本国防安全与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失去了可行性，日本“只有姑且放置现今已陷入极端困境的支那问题”。¹⁷²

满川在1918年初时仍认为德国将与英美一道成为战后世界的三巨头。¹⁷³但随着德国落败，英国将继承德国在中东与非洲的权益，再度扩张大英帝国。满川注意到，随着君士坦丁堡落入英国手中，英国的“开普敦—开罗—加尔各答”“3C政策”将扩大为“开普敦—君士坦丁堡—中国”的“新3C政策”，重申英国的亚细亚海岸铁道将把亚洲南岸一带都划为已有¹⁷⁴。同时，满川注意到美国经济在战争中实现的惊人发展，他指出美国的煤铁产量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债权国，而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将来率领盎格鲁撒克逊人崛起”的国家，¹⁷⁵其势力将向东亚扩展而来，日英同盟恐怕已没有任何对抗美国的权威。¹⁷⁶满川认为美国将利用其庞大的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担忧“自甘屈服于美国资本家，满足于做苦力之役”的中国将永远不能独立。¹⁷⁷到1919年初，他已经断定“今后威胁帝国之生存者，乃披民主主义假面之英美资本侵略主义也”¹⁷⁸，将英美锁定为未来的大敌。

¹⁷¹ 「革命時代の到来」、『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289頁。

¹⁷² 「何故に『過激派』を敵とする乎」、『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298、301頁。

¹⁷³ 如「時論 国防線の推移と南方亜細亜」、39頁。

¹⁷⁴ 滿川龜太郎「亞細亞南半の大勢」、『東方時論』1919年2月号。参见『奪はれたる亜細亜』、84、93頁。

¹⁷⁵ 滿川曉峯「列強の經濟的大勢」、『經濟時報』1918年9月号、9頁。

¹⁷⁶ 同前、9頁。

¹⁷⁷ 「社説 講和來と亜細亜の運命」、『大日本』1918年12月号、10頁。根据文中对英德世界政策、土耳其现状的细节评述，可推知本文作者为满川。如提及美国教士A.G.丹尼尔斯在《世界大战》一书中将土耳其的溃败解读为圣经中的末日之战，又如提及了英国将“3C政策”扩展为“新3C政策”，与满川其他论文中的表述相同。

¹⁷⁸ 「何故に『過激派』を敵とする乎」、『三国干涉以後[増補新版]』、297頁。“资本侵略主义”的原文为“資本の侵略主義”，这一概念将资本主义与侵略扩张视作内在关联的现象，内含社会主义的逻辑。北一辉在《外史》中就已使用过“欧美的资本侵略”这一表述，而满川第一次使用此概念是在反对西伯利亚出兵的意见书《何故以过激派为敌乎》中。满川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的契机，可能正是日本国内爆发的米骚动，他在1918年10月的评论中提倡推行“米谷国营、土地国有”的政策以保障民生，抨击过度保护私有权的国家，提出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造设想（犹存楼客「米穀国营 土地国有」、『大日本』1918年10月号、21頁）；在同年12月的论文《讲和到来与亚细亚的命运》中，他提到“大资本所存之处生出大势力，大势力盘踞之处产生独占权”，指出了经济投资必将带来势力范围划分的逻辑。（「社説 講和來と亜

满川始终认为日本只能通过海外拓殖移民解决激化社会问题的人地矛盾，米骚动煽起了日本社会“破裂”的危机感，寻找海外拓殖空间的紧迫感因而更加强烈。而海外移民问题又因为澳大利亚、南非等英领和美国针对有色人种的移民限制政策直接与种族问题产生了关联。针对歧视有色人种移民的欧美法律，日本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将“种族平等条款”加入国际联盟规约，该条款要求各国不因种族或国籍区别对待各自境内的外国人。¹⁷⁹然而，日本的提案在和会上遭到了推行“白澳政策”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的激烈抨击，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国内舆论压力下反对该议案，最终种族平等条款没有得到通过。原本观念性的人种矛盾经由移民拓殖这一媒介实现了具象化，种族歧视威胁日本生存权利的逻辑得以确证，推动这一过程最终完成的正是“大地主”英美在和会上对种族平等条款的否决。

近卫文麿在他 1918 年 11 月的评论《排击英美本位之和平主义》中告诫日本国民警惕“潜藏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背后的诸多不自觉或自觉的（英美）利己主义”。¹⁸⁰满川也同样对一战末期泛滥的理想主义抱有怀疑。在威尔逊高举民主大旗宣布美国参战后，满川多次明确表露不信感，如 1918 年 6 月他便引用俄国革命派曝光的土耳其分割密约，强调列强们只会在不背离自己利益的范围内倡导正义人道。¹⁸¹在 1918 年 8 月的另一篇论文中，他将美国主张的国际道义与民族自决称作装点门面的尝试，指出理想主义无法取代国家的现实利益：“今德国在向俄国推进之时，可知放弃无合并无赔偿主义反倒有利；民族自决主义被逆用到令俄领内诸多小邦分立，英国亦渐感民族自决主义之愚”。¹⁸²种族平等法案在巴黎和会上的受挫毋宁说为日本社会，乃至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者完成了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祛魅，他们从而开始以彻底的现实政治视角思考欧美列强与亚洲的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革命的气息与英美霸权的阴影使满川深感危机，令他苦苦思索如何打开日本困局的方策。与英美的矛盾并非全无调和的可能，¹⁸³但日本在地缘安全、海外移民上的利益与英美世界霸权的全面相撞，确实意味着通过列强国际协调维持日本利益的余地越来越小。对满川而言，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缓解东亚的安全危机，都需要变革以英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认为“若非设法脱离英美之羁绊，日本难免成为釜中之鱼的命运”。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作为日本盟友的资质，日本无论是在财力还是在军备上都缺乏足够的力

細亜の運命』、『大日本』1918年12月号、10頁。）

¹⁷⁹ 徐国琦：《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尤卫群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16 页。

¹⁸⁰ 庄司潤一郎「近衛文麿に見るアジア主義の変化——中国認識を中心として」、長谷川雄一編著『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157 頁。

¹⁸¹ 満川亀太郎「時論 亜細亜の西門」、『亜細亜時論』1918年6月号。参見『奪はれたる亜細亜』、308 頁。

¹⁸² 「社説 占領南洋諸島を改称すべし」、『大日本』1918年8月号。参見『奪はれたる亜細亜』、431 頁。

¹⁸³ 直到 1920 年，满川仍在思考以日英同盟续约为杠杆迫使澳大利亚开放移民限制的可能，主张利用英美之间在加拿大、中国的矛盾开拓日本国际空间。「太平洋問題の新意義（大正九年一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113 頁。

量，若和英美开战“日本便只有自灭于地球之上”，因而“现在只能在泪眼中雌伏”。¹⁸⁴在强烈的国际孤立感中，满川转而向苏俄寻求国际支持，他认为世界上有潜力摧毁英美“资本侵略主义”的只有苏俄的“过激主义”，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支持反革命势力是“自毁最后的国际支柱”。¹⁸⁵

在大战结束之初，满川虽仍希望“促进亚细亚同族的奋起，以他们的兴隆为目标，致力维持世界均势”，¹⁸⁶也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审议种族平等条款的动向，¹⁸⁷但所提出的具体做法仍止步于“表示深厚同情”、呼吁种族平等和“指导开发”亚洲。¹⁸⁸面对美国资本控制中国的危机感，满川提出的抗衡措施是引导“事实上掌握东南亚商权”的华侨回祖国投资同美资竞争，这一提案生动地道出了亚细亚主义心情与政策取向在满川身上的分离——既表明他希望中国保持独立的心情并不虚假，也充分暴露了“在财力上到底不及其他强国”的日本在实际执行亚洲连带政策时的无力。¹⁸⁹但如上文所示，“内外皆已途穷”的困局驱使着满川尝试在世界中寻求支持力量，大战后逐渐抬头的亚非民族运动既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挑战，却也为亚细亚主义的实现带来了希望。

第二节 亚洲民族主义的向背

从1913年的《敌乎友乎》起，满川即已展示凭借“民族自觉意识”判断一国一族之前景的思路。执着于国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能直接转化现实力量的精神决定论逻辑，在满川1918年的著作《列强领土上及经济上的发展》中得到了系统阐述：罗马成为古代最强大之帝国的原因，在于“单独的个人没有任何价值，仅在增进共同体之利益时才获得其价值”的共同体精神与国族至上主义。¹⁹⁰在1916年初，满川重新对中国革命寄予期待，也是由于《外史》的论说和中国革命志士的“现身说法”使他相信中国革命党人确有强烈的忧国奉公之志。“民族自觉=力量”的逻辑在理论上为亚洲复兴的理想注入了现实性。然而，每当亚洲各国的民族运动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时，上述逻辑的破绽就会清晰暴露，此时满川又会试图用“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或“反抗运动源于列强煽动”的逻辑自圆其说。但正如上文反复提到的，在思考日本实际的对亚洲政策时，满川始终立足于现实国际环境下的成本收益计算，并未让

¹⁸⁴ 「行余日誌」、『満川亀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4頁。

¹⁸⁵ 「何故に『過激派』を敵とする乎」『三国干渉以後[増補新版]』、297頁。

¹⁸⁶ 「社説 講和來と亜細亞の運命」、第11頁。

¹⁸⁷ 他在1919年的“行余日誌”的3月4日项中记载了自己与一濑友三郎讨论废除种族歧视的情景，还于3月14日和23日两次列席日本的种族歧视废除大会。「行余日誌」、『満川亀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2-3,5頁。

¹⁸⁸ 「社説 講和來と亜細亞の運命」、11頁。

¹⁸⁹ 同前、10頁。

¹⁹⁰ 『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7頁。

自己的信念干扰现实理性。

从解放价值的角度来看，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倡议与兴亚理想存在相似之处。但满川并未与威尔逊主义产生共鸣，反而视之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当东欧的诸小国在大战后确实获得独立后，满川又得出民族自决仅限于白人的结论：欧洲小国因人种宗教与列强相同而得以享受民族自决的福利，“反观我亚细亚同族如何？土耳其如何，土耳其斯坦如何，波斯如何，阿富汗如何，印度如何”，¹⁹¹指出亚洲民族不仅未获独立，反而进一步陷入扩大的英美殖民帝国。在此处，界定“亚洲”的“种族-肤色”被视为比“民族”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反而加固了黄白人种对立的构图。

不仅如此，对于正在亚太地区建立殖民帝国的日本来说，中国大陆、台湾、朝鲜的民族主义更是直接与日本的帝国利益相冲突。如何应对东亚的反日民族运动，正是包括满川的所有亚细亚主义者的“阿基琉斯之踵”，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向他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1916年9月的论文《在外邦人的缺陷》中，满川曾基于巩固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的目的，批判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和朝鲜民众“毫无亲切爱护之情”。¹⁹²但当受到威尔逊鼓舞的朝鲜独立运动者们掀起“三·一运动”时，满川对其极尽冷言批判，强调日本给朝鲜带去的文明进步，甚至断言事大成性的朝鲜人没有民族自决的资格。¹⁹³

然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却表明亚洲的反日民族主义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五四运动见证了比“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更为激烈的反日浪潮，而满川也展示了比四年前更加彻底的沉默。五四运动期间寓居上海的北一辉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经受了巨大精神震动，在绝食与精神困境的状态下写就了日后成为犹存社行动纲领的《国家改造原理大纲》。满川在1919年5至8月不曾留下任何和中国相关的文字，但无疑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在同年9月的论文《青年日本的绝叫》中写道，使中国“如此深厚的排日思想产生结晶”的，是日本盲从欧美所执行的“窃取政策、高利贷政策”，日本自身必须深刻反省。¹⁹⁴

在日本与英美的对立格局趋于鲜明，而苦于在世界上寻求同盟力量的形势下，中国空前的反日运动有了新的严重性：问题已经不仅在于遭受欧美列强政治经济控制的中国能否成

¹⁹¹ 「社説 講和来と亜細亜の運命」、10-11頁。

¹⁹² 『奪はれたる亜細亜』、405頁。

¹⁹³ 「社説 朝鮮問題の再査」『大日本』1919年4月号，2頁。据满川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可知该文由他执笔，「行余日誌」、『滿川龜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5頁。“民族自决的资格”这一概念是满川用于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手段，但也是理解其民族主义观的关键。对于满川来说，民族自决的资格首先意味着生存的能力，他认为小国无法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行为体，甚至提出一国“至少须拥有五千万以上保有同一民族血脉的人口”才能有所成就，而朝鲜人若依靠韩国政府，“生存之自由尚不能享有”，遑论所谓集会结社自由。其次是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满川认为，在大韩帝国时代，朝鲜政令颓废、社会混乱、富源枯竭，正是在日本的总督政治之下朝鲜才面目一新；对于埃及，他同样表示，尽管埃及人希望英军撤离，但“英国若放手，埃及只会立刻破产”。此外，民族自觉意识的存在也是民族自决资格的要素——但关键在于一国的民族运动只有证明自身独立于域外大国操纵，才能被认为反映了真正的民族自觉。

¹⁹⁴ 「青年日本の絶叫（大正八年九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46頁。

为日本的强援，更在于如果放任中国的反日情绪滋长，在日美开战时中国将站在美国一边。满川开始设想“压海而来的百只太平洋舰队，凭借在支那受到狂热欢迎的余威开向我国”的最坏场景，他由此意识到已不能像1919年初提议的那样“姑且放置”中国问题，中日必须亲善。¹⁹⁵而两国的连带只能以顺应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式求取，满川强调，日本在与中国进行军事协同行动，实施进入中国西部遏制英国东渐的计划时，“必须获得中国的完全谅解”，和1917年时相比，他对中国的民族情绪表现了更高程度的敏感性。¹⁹⁶

经由曲折的道路，反日民族主义最终引导着满川回到了以中日提携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上来。相比之下，亚非民族的反英运动更直接地推动满川将他的战略构想的重心向亚洲倾斜。埃及从1919年3月起开始频繁出现暴动。印度民众不满政治改革的缓慢举行集会抗议，遭到英印政府的镇压，酿成了4月的“阿姆利则血案”。阿富汗的新国王于4月对英印发动战争。5月希土战争爆发，由凯末尔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开始崭露头角。中西亚的反英斗争让满川看到了亚洲民族普遍觉醒的征兆。

日本在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因五国代表的反对，最终未获通过。与英美为限制移民反对该提案不同，波兰、罗马尼亚投反对票，是出于对国内犹太人问题的顾虑。满川对“多年受世界之贱民待遇，犹且团结巩固而热心于民族运动”的犹太人寄予了深切同情。¹⁹⁷在写于1919年6月的《犹太民族运动的成功》中，满川在梳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1862年至1919年的发展历程之后，为以色列民族所经历的“出埃及”赋予了世界性意义。他将“出埃及”的故事视作民族发展历程的象征：“大凡一民族由无意义之团体生活的沉睡中醒来，进入拥有统一民族自觉（之境地），脱离旧域进而开始新天地之经营，这亦是一种‘脱离’的历史，其前途中必将有着某个应许之地”，强调了民族自觉意味着民族共同体的新生。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提出，犹太人成功复国并非偶然，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专心留意更大的世界的‘出埃及’”的时机，暗示将出现世界规模的民族觉醒¹⁹⁸。

亚非民族的抗英斗争随时间推移展现出了的可观的韧性，满川由此更加确信亚非民族意识的抬头。埃及的暴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呈现出蔓延全国的迹象。在1919年4月的评论《埃及国民运动》中，满川虽梳理了埃及从穆罕默德·阿里到穆斯塔法·凯米尔的埃及19世纪民族运动史，但仍对埃及独立的前景态度冷淡，认为尽管埃及人希望英军撤离，但“英国若放手，埃及只会立刻破产”。¹⁹⁹而到了同年9月的《亚非利加中亚细亚族的动摇》中，

¹⁹⁵ 同上，第45页。关于“姑且放置”中国问题，参见脚注173。

¹⁹⁶ 原文为“完全なる了解”。『亜細亜解放の新意義（大正八年十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6頁。

¹⁹⁷ 满川龟太郎「猶太民族運動の成功」『大日本』1919年6月号。参见『奪はれたる亜細亜』、326頁。

¹⁹⁸ 同上，第339页。

¹⁹⁹ 「埃及国民运动」、『奪はれたる亜細亜』、391頁。

满川却不得不承认埃及“出现了无法轻易处理的事态”。²⁰⁰他指出，现已落败的德国无暇策动英属殖民地叛乱，因此在埃及“可见相当根深蒂固之独立运动”，²⁰¹他通过完全排除列强操纵的可能性，终于承认了民族运动的独立性和亚非民族的主体性。

在席卷亚洲大陆的民族运动中，满川意识到印度、中西亚、北非各民族的反英斗争的潜在力量，这让他重新评估通过亚洲连带共抗欧美的可能性。正是当他充分感受到亚洲民族主义在对抗英美上的价值时，他才进一步地克服了侵略亚洲的欲望：国家力量的根源正是有活力的民族主义，亚细亚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各民族的自觉为基础；针对日本国内吞并中国的声音，满川反驳道，即便中国与日本完全合为一体，日本和亡国的中国军队从事亚洲解放也只是痴人说梦。²⁰²

由此可见，一战后亚洲民族运动的兴起是满川亚细亚主义的演进中的关键时刻。反英民族主义意味着亚洲合作抗击英美的现实性逐渐增强，也诱使满川在中西亚为“被列强看低、受同胞支那轻侮的孤立国”日本寻找潜在盟友。反日民族运动则告诫满川，觉醒后的民族主义不易驾驭，日本为避其锋锐必须与中国实现真正的亲善、求取亚洲民族的衷心认同。两种亚洲民族主义从不同的道路推动了满川的亚细亚主义超越原有边界，他最终提出了“亚细亚解放”“人种革命”的目标。

第三节 亚洲解放的宣言

在1919年10月的论文《亚细亚解放的新意义》中，满川首次提出了“亚细亚解放”的目标。他将今后的亚细亚问题表述为如何“将九亿苍生从财富与强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呼吁日本立于亚洲解放运动的最前线。²⁰³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时间和逻辑上看，对这一表述产生直接影响的，或为北一辉新写就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²⁰⁴1919年8月末，被满川派去上海迎接北一辉的大川周明带回了北正在执笔的《法案大纲》，满川看过后便将其奉为犹存社的行动方针。在《法案大纲》的卷八中，²⁰⁵北一辉提出，“国家在自我防卫之外，有为了受不义之强力抑压的其他国家或民族开始战争的权利（即当面之现实问题，为印

²⁰⁰ 满川龟太郎「雑纂 阿弗利加に於ける亜細亞族の動搖」、『亜細亞時論』1919年9月号、71頁。

²⁰¹ 同前、73頁。

²⁰² 「亜細亞解放の新意義（大正八年十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亞』、6頁。

²⁰³ 同前、2頁。

²⁰⁴ 杂志《大日本》同10月号的社论《亚细亚的大势》中直接使用了北一辉《法案大纲》中的“剑之福音”“与阶级斗争相比，民族竞争、国家竞争才是世界主要矛盾”等概念与观点，可以断定该文为满川所作。该文也提到“吾人在世界之解放前欲先从事亚细亚之解放”。「社説 亜細亞の大勢」、『大日本』1919年10月号、7頁。

²⁰⁵ 据满川回忆，大川带回的北《法案大纲》手稿刚好写到卷八的“开战的积极权利”一节，在“印度独立问题乃将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须做好觉悟”一句处停笔。『三国干渉以後[増補新版]』、201頁。

度之独立与支那之保全开战乃国家的权利)。”²⁰⁶北一辉所定义的“开战之积极权利”正为“亚洲解放”提供了逻辑前提。

从语义上看，“亚洲解放”提出了一个涵盖全体亚洲的亚细亚主义议程，在程度上超越了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亚洲开发，明确地将欧美的资本与暴力定义为斗争对象。但若探询其具体政策内涵则不难发现，所谓日本以积极行动解放亚洲的本质仍是中日提携和支援中国革命。在《亚细亚解放的新意义》一文中，满川主张日本为应对英国的侵略主义，应在获得中国“完全谅解”的前提下，出军突入甘肃陕西，切断海兰铁路，²⁰⁷再进入云南贵州，遏制英国的西藏侵略。但中国南北分裂的现状使日本没有可以获得谅解的对象，因此，为了缔结中日同盟，中国必须先通过彻底的革命完成统一；只有在新生后中国成为东亚强国时，日本才能与中国共同立于亚洲解放运动的阵头，²⁰⁸日本所应做的是“帮助青年支那贯彻其革命”。²⁰⁹此处，日本援助下的中国革命、中日缔结盟约、两国以共同军事行动驱逐中国境内的英国势力、两国联手解放亚洲的行动先后顺序得到了清楚地表述。

满川上述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以及北的“开战的积极权利”这一概念本身都包含着危险的扩张倾向。虽然满川此时处处留意将自己的主张与侵略主义划清界限，但日本出兵援助中国革命是否同样须寻求中国的“完全谅解”呢，此时尚未统一的中国又有谁能“谅解”日本？此外，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特殊使命”也难免在实践中带来对“特殊权利”的要求。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满川也提出在保全中国之外，“使东亚门罗主义波及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以威胁英国的“资本侵略主义”。²¹⁰在写于1920年底的《被夺走的亚细亚》序言中，满川肯定了日本支援亚非民族运动的责任，为日本将这一工作放手交给苏俄“感到无限痛恨”。²¹¹然而，相比于中日连带的方案，对印度与中西亚民族运动的援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时间表上都语焉不详，仍停留在抽象口号的层面。

除了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认识和北的思想影响外，满川在此时高呼亚洲解放，明显带有与苏俄竞争话语权的考虑。如上文所述，满川将苏俄视作共同对抗英美霸权的潜在盟友，反对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但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斗争的侧面怀有警惕。他在《亚细亚解放的新意义》中指出，“思想之侵入不能以刀剑应对”，主张日本必须提出比共产主义更加深入人心的价值理念，“溶解过激主义的盐，正是掩八纮而为宇的我之皇道”。列宁政府于1917年底颁布了《告俄罗斯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

²⁰⁶ 【北一辉著作集 第二卷】、272 頁。

²⁰⁷ “海兰铁路”即从连云港（海州）至荷兰鹿特丹的铁路。

²⁰⁸ 「亚细亚解放の新意義（大正八年十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5-6 頁。

²⁰⁹ 「青年日本の絶叫（大正八年九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46 頁。

²¹⁰ 同前、第 49 頁。

²¹¹ 「亜細亜解放の新意義（大正八年十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6 頁。

布放弃沙俄同周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此后向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派出使节，加强与中西亚地区反英民族力量的联系。及至 1919 年 10 月，满川已经注意到了苏俄政府对中西亚反英民族运动的支持及其成效，“今当俄国过激派正宣传亚细亚人之解放，奉皇道之我国不可有追英国侵略主义之尻尾、连过激派尚且不及的谬误”，主张为在意识形态上胜过苏俄，日本更必须投身于亚洲解放运动。²¹²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口中的“皇道”后来被发展为在天皇治下统一世界的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但在此时，他尚且在文脉中明确地将俄国的领土侵略政策和英国的经济侵略政策排斥在“皇道”之外，声称皇道与亚洲解放“异称同体”。²¹³当亚洲解放的目标被提出时，它已经沾染了天皇崇拜意识形态的色彩。

不同于对威尔逊主义的讥讽，满川对于将亚洲民族囊括在内、并产生巨大现实威力的列宁版民族自决主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列宁“一举民族自决、无合并无赔偿的旗帜，多年为英俄两国侵略主义所压虐的中亚诸民族正如大旱中得云霓”。对他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提防，但苏俄可以成为日本解放亚洲的盟友，他进而提出振兴亚洲的机会在于中日两国提携和获得苏俄谅解之两点。²¹⁴到了 1920 年初，亚非民族的主体性已清晰浮现。他指出埃及“恐怕已形成健全的独立运动”，青年学生都是持反英思想的民族运动者。²¹⁵他曾在 1918 年 10 月将波斯废除与俄国的不平等条约视作德国操纵的结果，而到了 1920 年 2 月，满川将这一举动形容为波斯人民“意欲伸张民族自由之气”的尝试。²¹⁶中西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们受苏俄宣传的影响，与之合作试图颠覆大英帝国，“波斯、阿富汗、土耳其、鞑靼等诸邦志士，怀兴亚之理想几经生死……当此时彼等向俄国过激派求取唯一的活路”，认为亚细亚主义为中西亚志士们所共享。²¹⁷

此外，一战后黑人泛非运动的兴起让满川看到了有色人种共同挑战白人世界优势的可能。1920 年 8 月 2 日，黑人运动家加维在纽约哈莱姆召开了国际黑人大会，在演讲中宣布要使

²¹² 同上，第 7 页。此处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满川直到 1919 年 10 月方才提及苏俄的民族解放政策。他在 1920 年 2 月坦言，“我国国民最初被英国报纸的宣传所欺，对过激派的观察产生了根本谬误，现今时日之经过使事实鲜明”，满川自己恐怕也是被媒体报道所误导者之一。1919 年中，满川所主持的老壮会曾多次邀请从苏俄返回的日本人分享实地情报，如在 5 月 17 日的第十一次聚会上，中山逸三讲述了俄国的现状，称“列宁、托洛茨基是无比的豪杰”，这些在老壮会上交换的新信息或许是促使满川重新认识苏俄的动因。（满川龟太郎「老壮会の記」、【大日本】1919 年 6 月号、99 页。）

²¹³ 同前、7 页。

²¹⁴ 「三 C 政策の拡大と中亜の動搖（大正九年二月）」、『奪はれたる亜細亜』、第 104 页。

²¹⁵ 同前、94 页。

²¹⁶ 「東方問題の難関（大正九年二月）」、323 页。

²¹⁷ 同上。需要在意的，为何满川没有将中西亚的反英斗争视作苏俄一手策划的煽动并不否认亚非民族的主体性？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与英美的威胁相比，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受协约国侵袭的俄国已经由大帝国变身为了被英美压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主张国家改造与世界革命的满川对苏俄的意识形态也保有同情，这使他不以故意揣测苏俄。另一方面，满川认识的印度革命志士巴拉卡图拉（Abdul Barakatullah）前往莫斯科请求列宁政府支援印度独立运动，这类经历或使满川确信，虽然苏俄的宣传效果显著，但亚非民族运动的自主性也不可否认。

非洲脱离欧美羁绊，建立由黑人统治的黑人共和国。满川在同年 10 月的论文中提出了“人种革命”的构想，“若为亚细亚人光复被夺走的亚细亚而高唱黄人亚细亚主义，为被夺走的亚非利加实现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非洲主义今日正渐萌芽，这不正是敲撞世界人种革命之晓钟者吗？”²¹⁸将亚细亚主义的外延扩展到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有色民族上。

然而，尽管满川多次对印度、中西亚乃至非洲的民族运动流露欣赏与同情之意，正如上文已说明的，他始终不曾提及任何**能转化为实际对外政策**的日本对印度及中西亚民族的“责任”。无论是中日亲善、日苏交好，还是对亚非民族反抗英美运动的关注，都是设想日本与英美开战的语境下提出的，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满川在印度以西地域保持的战略模糊，亚洲解放本身都只有在与美英战争的过程中才可能完成。

但不执行积极的援助政策并不意味着日本应当束手以待。满川在亚非民族的反抗斗争中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力量，并意识到取决于日本的实际行动，民族主义的矛头随时有可能转向日本——亦即他理解了民族运动并非由种族划分决定，而是基于彻底的反侵略“攘夷精神”，如果不将日本的政策彻底与英美划清界限，亚洲的民族主义恐怕也不会成为日本的力量，日美开战时中国必将站在美国一边，而“吾人与支那战于陆上，与美国战于海上，果将坚持几年”。对满川来说，为了增加赢得战争的几率，日本应当“给予（不仅限于中国和朝鲜的）全亚细亚的青年以感激、令其共鸣，以其深厚的精神同情为（日美战争的）背景”，而日本自身的国家改造成为了争取亚洲民族同情的归结。²¹⁹

一战落幕后，列强势力重归东亚，日本与英美在地缘竞争和拓殖移民战略上的冲突格外凸显，满川在强烈的危机感与国际孤立感中一面感叹日本已无路可走，另一面仍试图寻求国际同盟力量，呼吁日本与苏俄共同对抗“英美资本主义”。但随着大战后亚非民族运动的逐渐抬头，满川肯定了亚非民族反帝浪潮的巨大力量，重新评估了通过亚洲连带为日本开辟国际空间的可能性；在日本与英美对立的迫切感之下，东亚的反日民族主义则逼迫着他反思日本的亚洲政策中的侵略倾向。他受北一辉《原理大纲》的启发与苏俄民族政策的刺激，在 1919 年 10 月提出了“亚细亚解放”的目标，呼吁日本从白人压迫下解放所有亚洲民族，但其具体政策意涵只包括支援中国革命和求取全亚洲民族的精神支持，而亚洲的真正解放必须等待中国在革命后的富强和日本改造的完成。

满川将他 1916 年至 1920 年间发表的涉及亚洲的时评论文辑成一册，在 1921 年初以《被夺走的亚细亚》为题出版。该书的序言写于 1920 年 12 月，完整地呈现了截至 1920 年底满

²¹⁸ 满川龟太郎「革命の大帝国」、『雄叫』1920 年 10 月号。转引自福家崇洋『満川亀太郎 慷慨の志猶存す』、134 頁。

²¹⁹ 満川龜太郎「日米戦争の利害」、『奪はれたる亜細亜』広文堂書店、1921 年、355-356 頁。

川的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在这篇文章中，满川首次在亚细亚主义的语境下提到三国干涉还辽，他写道，三国干涉是他记事以来“欧洲强加于亚洲之胁迫的最初者和最大者”²²⁰，为三国干涉赋予了超越日本一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他强调亚非民族的主体性，甚至提出早在日俄战争以前，亚洲民族就已展开救国的努力，“不管是在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阿富汗，还是在菲律宾、埃及、鞑靼、安南、暹罗，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在独立国家中则化为革命运动，在属国中则化为独立运动”。²²¹满川进而肯定了日本支援亚非民族运动的责任，描绘出一幅解放斗争席卷世界的图景，呼吁日本行动起来：

“过去从属于德国的古老土耳其，今日仅在君士坦丁堡仰视英法的鼻息，但从山河荒废中诞生的青年土耳其勃然奋起于安纳托利亚，经由革命的骁将恩维尔帕夏与劳农俄国相策应，以渐图驱逐欧洲资本主义……英国势力[从波斯]的撤退相应地意味着波斯国民运动的成功……印度独立运动现在正以美国纽约为根据地，向全世界展开宣传。埃及也在形式上获得了多年渴望的独立……青年埃及与黑人亚非利加相共鸣，欲将酿成全非洲解放的气运。全亚细亚同胞都同此悸动。”²²²

在这篇序言中，对被欧洲奴役的亚洲人民的同情、囊括全体亚洲民族的广阔视野、各民族的觉醒与斗争，和日本支援亚洲民族运动的使命等元素清晰可见，这标志着满川龟太郎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成型。但在畅达的文势与强烈的心情之外，日本应当展开何种实际行动的表述仍相对模糊：日本应当支援中国革命；但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域，则仅提出日本须回应他们“更加仰望日光”的期待。此外，满川为了强调自己亚细亚主义关切的连续性，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过去数年中自己思想波折的痕迹，既没有提及一战爆发前夕自己对亚洲门罗主义的断念，更是对自己多年对中西亚民族的轻视闭口不言。揭示这一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正是本文的任务之一。

²²⁰ 『奪はれたる亜細亜』序言、2頁。

²²¹ 同前、2-3頁。

²²² 同前、6-7頁。

结论

本文基于对满川龟太郎的时评论文、回忆录与日记等文本的综合考察，聚焦于其亚细亚主义，描绘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智识发展的轨迹。结论部分将针对亚细亚主义先行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总结概括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一战前后经历的演变，分析促使其亚细亚主义构想产生和拓展的驱动力，检视亚细亚主义心情与国家理性在满川身上体现的结合与竞争，探讨满川为“亚洲”概念赋予的意义。

一、理想与政策：满川龟太郎一战前后亚细亚主义的演变轨迹

继青少年时代的亚细亚主义萌芽后，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一战前后经历了“低落期”（1913-1915）、“过渡期”（1916-1918）和“成型期”（1919年及以后）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其亚细亚主义“心情”的强度存在差异，面向亚洲的政策构想也呈现出清晰的变化。

尽管满川从少年时期就对亚洲拥有认同与同情，1913年中国二次革命的失败却使满川认定中国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亚洲民族只是自私自利的亡国之民。到一战爆发前他却已在心灰意冷中宣布放弃亚细亚主义。在一战初期，亚洲几乎不曾出现在他笔下，他对亚洲的关切似乎彻底消失了。而到了1916年初，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对中国革命的解读重新点燃了满川心底“复兴亚细亚”的理想，而与中国革命志士建立起的个人情感联系，化作“支援支那革命”的心情，再次唤起了满川对亚洲命运的同情。另一方面，尽管满川与印度独立运动志士及印度研究者大川周明同样关系密切，对印度与中西亚的民族运动显示了研究兴趣，他却仍将印度、波斯此时的斗争运动看作德国操纵的结果。但1919年起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民族运动让满川看到了“世界性的‘出埃及’”——亚洲民族的普遍觉醒，他意识到亚非民族的主体性后，改变了此前对中西亚民族的冷漠态度，对其反英斗争表示了同情与敬意。到1920年代初，他的亚细亚主义心情的外延已拓展到包括黑人和犹太人的所有被压迫民族。

满川的亚洲政策构想的变化步调也与其心情消长保持了总体一致。他1908年时提出的“亚洲门罗主义”的抽象口号随着东亚时局的恶化迅速夭折了，在1913年，满川一时转向了中国分割论，主张日本在与欧美的东亚竞争中夺得应有的份额，亚洲成为他设想中的拓殖的目的地，日本将通过与俄国和英国的合作向东南亚太平洋扩张。而在1916年以后，满川接受了《外史》的基本观点，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中日两国结成国防与经济同盟，击退意欲从南方侵染东亚的欧美列强；而与此相反，对于印度及中西亚，日本并不负有任何经济或军事责任，仅在“充分利用亚洲的资源、指导亚洲民族文明开化”的方面对整个亚洲负有使命，后者显然只是正当化日本的中西亚殖民的话术。大战结束后，满川提出了“亚洲解放”的目标——日本不仅须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实现统一、助中国成为东亚强国，还在理论上肩负

着支援中西亚民族运动的责任；但实际上，对印度及中西亚的援助仍必须等待中国革命和日本改造的完成。

由此，经由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世界局势变化，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心情关切上覆盖了包括中国、印度、中西亚的整个亚洲大陆，政策提案的激进程度也不断增加，最终在逻辑上到达了“亚洲解放”和“人种革命”，但在政策实践上依然以中日两国的改造（革命）和连带为核心。

二、心情与国家理性的艰难相遇

然而，虽然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心情与亚洲政策提案的变化在时间上大致同步，后者在发生机制上几乎与前者绝缘，亚细亚主义心情从未成为塑造满川实际政策构想的决定因素。在与国家理性的竞争中，亚细亚主义心情始终居于下风。

满川每次调整其亚洲战略构想，所考虑的都是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国家利益与国防安全的迫切性。在一战期间中国形势变化莫测、革命屡陷僵局的情境下，满川在1916年重新燃起的兴亚理想也反复出现动摇，甚至一度回归一战初期对中国“事大主义”的判断；此时阻止他重返中国分割论的，是大战中出现的军事与地缘政治动态而非亚细亚主义心情，大英帝国在中西亚与非洲的扩张让他意识到西力东渐之迅疾，“总力战”时代的到来则唤起了对日本资源稀少的危机感，正是在国家理性的指令下，满川才开始主张与中国紧密结合以寻求活路。一战后满川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也是在与英美的利益协调余地不断缩小的背景下展开的，回归亚洲与其说是兴亚理想的驱使，毋宁说是源自日本国际孤立地位的无可奈何。

但在一战前后，亚细亚主义也因为逐渐抬头的亚洲民族主义首度获得了作为政策的现实可行性。满川作为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对于行为体间的力量关系保持着敏感性，却也认同执着于国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力量的精神决定论逻辑，因此当《外史》和中国革命志士展示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民族自觉意识时，亚洲复兴对满川来说才开始具有现实性。一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了亚洲连带的现实可行性，但正如满川对埃及的评价的变化所示，只有当民族运动证明自身独立于大国煽动的自主性、展示鲜明而持久的力量之后，满川才会将亚非民族反帝运动视作日本的潜在盟友。长谷川雄一认为，满川的亚细亚主义在一战期间由观念的转变实践的，是因为他与亚洲志士的交往；²²³而本文通过细致梳理满川智识发展的脉络发现，造成这一变化的实际上是亚洲连带本身在国际政局变动中逐渐增强的紧迫性和现实可行性。

作为“力量”的亚洲民族主义在满川的亚细亚主义理想与国家理性之间架起了现实性的

²²³ 長谷川雄一「満川亀太郎における初期アジア主義の空間——明治末を中心に」『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142頁。

桥梁，同时也逼迫他反省日本政策中的侵略倾向。满川意识到，若以吞并中国的方式实施“中日连带”，反日民族主义将给日本的统治带来极大困难，为了在西力东渐与“总力战”带来的危机向中国求生存，只能通过“放弃利权、吐露诚意”的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在五四运动的反日怒潮之后，满川开始恐惧中国在未来的日美战争中将站在美国一边，从而加强了对日本侵略倾向的批判，并为避免触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强调了中日军事合作构想中两国的对等地位，开始严肃地思考求取亚洲民族的衷心同情。最终令满川的亚细亚主义能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侵略的，并非其纯粹的亚细亚主义心情，反而是其亚细亚主义政策背后的现实主义逻辑。

绪论中曾提到，坂野润治提出亚细亚主义者与脱亚论者一样都将日本国家的扩张作为政策构想的前提。但正如满川的例子所显示的，即便是在国家理性的逻辑下，侵略扩张也绝非是不言自明的。“盲目喷涌的权势将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²²⁴“皇道的宣布”没有界限，但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行使和利害争夺必须在本质上具有界限意识。²²⁵通过现实成本收益的计算，满川才竭力反对日本在面临对美作战风险的情况下侵略民族主义觉醒的中国。事实上，满川始终清醒冷彻的现实主义国家理性正是他最突出的特质：重视政治行为的现实条件与后果，基于权力-利害关系的权衡计算构想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这一优先目标。满川对以军事和经济实力界定的力量关系的敏感性使他能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能力的界限。不同于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想象日本经过彻底改造后便可独自担负起解放亚洲的使命，满川反而在消除亚洲各国对日厌恶的意义上理解国家改造的价值。在1925年，满川构想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亚细亚联盟”：

“最强韧的锁链由最强韧的铁环组成，即便某一环非常强韧粗壮，如果其中某一环脆弱了，这把锁便派不上用场……亚细亚全体需要拥有‘十’的力量，土耳其是‘十’、波斯也是‘十’、支那也是‘十’，只有全员都拥有‘十’的力量，亚细亚全体才能君临世界。为打造如此强劲锁链而怀有理解同情、进行援助，正是日本最大的使命。”²²⁶

在这里，日本必须借助亚洲各国的力量才能赢得与英美的竞争，这与同一年中大川周明提出的由日本全权代表亚洲的“日美决战论”形成了鲜明对照。²²⁷

一战期间，亚细亚主义的心情与国家理性的逻辑在满川身上互无交涉地展开，在现实局势的推动下终于在1919年相遇了。即便是此时，对印度中西亚民族运动的支援仍具有相当的政策模糊性。但随着1920年代起中日两国国家目标的全面相撞，基于纯粹利益计算的亚

²²⁴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第63页。

²²⁵ 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59页。

²²⁶ 『世界現勢と大日本』、114-115頁。

²²⁷ “东西之战云云是概念上的，绝不意味着全亚洲结盟、全欧洲结盟后进行战争。事实上，代表欧洲的一国和代表亚洲的一国，被选为代表东西的战士，在此为了实现新世界不得不相互交战。上天似乎正把日本选作这样的战士。”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之道』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92頁。

细亚主义也将失去转圜的空间。满川虽不像北和大川在满洲问题上持强硬主张，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做的也只是为日军的行动正当化。

三、“亚洲”的迷思

满川为了日本的安全而重视中国的保全，又为了中国的保全而关注位于西力东渐路径上的印度与中亚，将视野扩展到了包括非洲与东南亚的全体亚非地区，在最终在战后的亚非民族运动中将关切给予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全体被压迫民族。他亚细亚主义中的“亚洲”概念由此获得了极为广阔的外延。但考虑到他并未提出面向印度中西亚的具体政策构想，其“亚洲”概念的内涵也只能在心情与逻辑层次上探讨。

在1908年的《亚细亚问题的研究》中，满川论证亚洲同一性的论据有（1）历史成就、（2）人种肤色和（3）遭受欧美列强压迫三点。随着满川在一战期间将整个亚洲纳入视野之中，对亚洲特质的论证同样围绕上述逻辑展开。他在1917年11月提出，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都进入了“回顾的时代”，中国革命党人以效仿四千年前汉族祖先的行迹、复兴中华文明为理想，印度开始憧憬其三千年前文明绚烂的孔雀王朝，再次以亚洲文明的历史成就作为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基础。²²⁸而当满川在1917年1月试图论证日本相比于欧美更有促进亚洲民族文明开化的资格时，他诉诸种族因素为亚洲的一体性填充具体内容。他引用克罗默的《古今的帝国主义》中“宗教和种族的差异使帝国内的同化变得困难”的观点，感叹“我们日本国民……与亚洲民族属于同一种族乃天之妙机”，强调种族的相同使日本更容易完成向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²²⁹

然而，满川有意识地使历史荣光与人种血缘的逻辑从属于亚洲被欧美压迫的逻辑。他在著作《列强领土及经济上的发展》中提出，战争的爆发以利害为中心，而绝非以种族划分敌我双方，现阶段黄白人种的对立也正因为西力东渐背景下二者利害的不一致，而“若列强放弃于亚细亚之一切既得权利，撤退回本国，如黄白问题者可立刻解决”。²³⁰他还在《被夺走的亚细亚》的序言中强调，对于自己来说，该书中“被夺走的亚细亚”的踪迹，“比万里长城、波斯波利斯的败殿、婆罗浮屠的佛迹都有着更加贵重的意义和价值”。²³¹由此，“历史文明悠久的亚洲”“黄种人的亚洲”被置换为“被欧美压迫的亚洲”，其内涵也从历史记忆、生物特征变为了权力-利益关系。

但权力-利益关系并不能赋予“亚洲”以稳定持久的内涵。以利害相合者必以利害而分，如果亚洲摆脱了贫穷、落后与屈辱而欧美丧失了世界优势，如果满川真的如愿以偿看到了日

²²⁸ 「回顧の時代」、39-40頁。

²²⁹ 「自主的日本国民論」、10-11頁。

²³⁰ 「列強の領土的並經濟的發展」、275-276頁。

²³¹ 「奪はれたる亜細亞」序言、8頁。

本解放从英美手中解放亚洲的那一天，因“被欧美压迫”而聚合的“亚洲”就会立即失去意义。此处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能否从亚细亚主义“反对白人压迫”的目标中演绎出“反抗压迫”的目标，即在权力关系中出于劣势地位的亚非民族不止步于倾覆现有的权力关系，而进一步地为权力关系提出新的规范。

亚细亚主义可能顺应竹内好的期待，完成审判帝国主义的使命吗？对饱受欧洲蹂躏的亚洲民族的同情，理应孕育着些许否定“强权即公理”的剑之福音、提出基于道义的国际交往规则的可能性。但满川的例子则显示，即便拥有强烈的兴亚心情与解放价值，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已把以力量为第一的现实主义逻辑内化于心了。在对人性和国际关系的深刻悲观之中，基于道义的国际秩序只有在世界统一之后才会实现。由于生存竞争、权力政治的逻辑，对国际道义的追求反而导向了由日本征服世界的欲望。满川少年时期所作的一首诗生动地道出了这种矛盾：“梦绕尼罗之河畔，金字塔上旭旗翻，世界统一初实现，十亿苍生浴圣恩，虐杀迹绝革命都，和平福音满波兰，月可吟苏（必利尔）湖之秋，花可醉巴黎之春。”²³²亚细亚主义心情准备了反抗种族压迫的动力，但要提出基于道义和对等关系的国际秩序构想，还缺少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和平等主体的权利意识，而后二者并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亚洲”能够提供的。

对于满川而言，理想和现实是两个次元的事物，纵使其心情再澎湃、理想再危险，他思考亚洲政策的出发点始终只是现实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但即便是他相对具体的中日提携方案，其现实性也在 1920 年代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中逐渐消退。支援中国革命的计划的组织方案和具体时机依然模糊不清，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特殊使命”也难免在实践中带来对“特殊权利”的要求。为了避免日本的行动演变为侵略行径，通过国家改造清除动机不纯的旧政治势力成了最后的逻辑出路——大亚细亚主义是否虚妄取决于日本国家改造理论是否真正是革命的。²³³但不论国家改造在理论上是否可能实现，现实中发动“昭和维新”的青年将校们都缺乏满川对现实政治形势的敏感度，缺少“作为政治决断之前提的对现实之逻辑因果关系的判断”，最终将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²³⁴

未来的满川研究可关注在 1920 年以后他的亚细亚主义政策构想与国家改造运动的互动、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其亚细亚主义的变化，以及 1930 年代初他对“昭和维新”政变活动的态度。另外，满川的军备政策论、教育政策论和满蒙观在其一生中的展开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²³² 晓峰生「矢来閑談」、『経済時報』1916年3月号、36-37頁。

²³³ 参见 松本健一「大亜細亜主義の虚妄——満川亀太郎・下中弥三郎論」、『革命的ロマン主義の位相』。

²³⁴ 橋川文三「日本ファシズム思想的特質」、『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119頁。

参考文献

一、満川亀太郎相关史料

(一) 著作

酒巻貞一郎『袁世凱伝』啓成社、1913年。

満川亀太郎『列強の領土的並経済的発展』広文堂書店、1918年。

満川亀太郎『奪はれたる亜細亜』広文堂書店、1922年。

満川亀太郎『黒人問題』二酉名著刊行会、1925年。

満川亀太郎『世界現勢と大日本』行地社出版部、1926年。

満川亀太郎『ユダヤ禍の迷妄』平凡社、1929年。

満川亀太郎『激変渦中の世界と日本』先進社、1932年。

満川亀太郎『三国干渉以後』平凡社、1935年。

(二) 資料集

北一輝／大川周明／満川亀太郎『アジア主義者たちの声 下：猶存社と行地社、あるいは国家改造への試み』書肆心水、2008年。

長谷川雄一／C・W・A・スピルマン／今津敏晃編『満川亀太郎書簡集——北一輝・大川周明・西田税らの書簡集』論創社、2012年。

満川亀太郎著、長谷川雄一／C・W・A・スピルマン／福家崇洋編『満川亀太郎日記——大正八年～昭和十一年』論創社、2011年。

満川亀太郎『三国干渉以後[増補新版]』論創社、2013年。

(三) 报刊

『大日本』『経済時報』『亜細亜時論』『東洋』

本文所参考満川亀太郎论文详细目录见附录。

二、参考文献

(一) 日文文献

伊藤信哉／萩原稔編著『近代日本の対外認識 I』彩流社、2015年。

大川周明『印度に於ける国民的運動の現状及び其の由来』代謄写本、1916年。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

小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東京宝文館、1916年。

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 第27巻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小学館、1976年。

刈田徹「満川亀太郎の青少年期の思想と行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その民声新聞時代を中心に」、『政治・経済・法律研究』十〇巻二号、2008年3月。

刈田徹「満川亀太郎の青少年期の思想と行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その『海国日報』記者時代を中心に」、『政治・経済・法律研究』十二巻二号、2010年3月。

北輝次郎『北一輝著作集 第二巻』みすず書房、1972年。

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近代日本の革新論とアジア主義——北一輝、大川周明、満川亀太郎らの思想と行動』蘆書房、2015年。

竹内好編『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1963年。

奈良岡聰智『対華二十一カ条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書店、2007年。

萩原稔『北一輝の「革命」と「アジア」』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

橋川文三著、筒井清忠編『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狭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1) 序章 アジア主義とはなにか」、『東亜』No.410、2001年8月号。

長谷川雄一編著『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思想の実像』ちくま学芸文庫、2013年。

福家崇洋『満川亀太郎 慷慨の志猶存す』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年。

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松本健一『革命的ロマン主義の位相』伝統と現代社、1973年。

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書店、2000年。

(二) 中文文献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日]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熊达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刘峰：《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与行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刘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期。

刘峰：《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政策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潘吉玲：《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关于近代日本文化的一些思考》，《日本研究》2005年第4期。

戚继章：《日本大亚洲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继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第四卷》，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李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徐国琦：《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尤卫群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英]约翰·基根：《一战史》，张质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张玉萍：《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王美平：《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以对华观为切入点》，《历史教学》2016年第14期。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继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翟新：《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读书》2010年第4期。

附 录 本文所参考满川龟太郎论文目录

1914 年以前

- 経済時報. (新年號) (97) (経済時報社, 1911-01) 亞細亞問題の研究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7 月號) (127) (経済時報社, 1913-07) 太平洋問題の研究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8 月號) (128) (経済時報社, 1913-08) 太平洋問題の研究(二)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9 月號) (129) (経済時報社, 1913-09) 亡國への支那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11 月號) (131) (経済時報社, 1913-11) 敵か味方か / 滿川曉峰

1914 年

- 経済時報. (新年號) (133) (経済時報社, 1914-01) 編輯局より / 南溟庵
経済時報. (2 月號) (134) (経済時報社, 1914-02) 時代教育私論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2 月號) (134) (経済時報社, 1914-02) 編輯局便り / 南溟庵
経済時報. (3 月號) (135) (経済時報社, 1914-03) 時代教育私論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3 月號) (135) (経済時報社, 1914-03) 風塵餘録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4 月號) (136) (経済時報社, 1914-04) 時代教育私論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4 月號) (136) (経済時報社, 1914-04) 風塵餘録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5 月號) (137) (経済時報社, 1914-05) 南北進守の論争 / 滿川曉峰
新世紀. 第 2 年(5) 新世紀社 (新世紀社, 1914-05) 噴火山上に在る大隈内閣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5 月號) (137) (経済時報社, 1914-05) 風塵餘録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6 月號) (138) (経済時報社, 1914-06)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6 月號) (138) (経済時報社, 1914-06) 南北進守の論争(中)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7 月號) (139) (経済時報社, 1914-07) 國民の健康問題と民族競争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7 月號) (139) (経済時報社, 1914-07) 山座公使を哭す / 劔書樓主人
経済時報. (8 月號) (140) (経済時報社, 1914-08) 國民の健康問題と民族競争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8 月號) (140) (経済時報社, 1914-08)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9 月號) (141) (経済時報社, 1914-09) 大戦亂と將來の國際政局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9 月號) (141) (経済時報社, 1914-09)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10 月號) (142) (経済時報社, 1914-10)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11 月號) (143) (経済時報社, 1914-11) 南北進守の論争 / 滿川曉峰
経済時報. (11 月號) (143) (経済時報社, 1914-11)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齒科新報. 7(11) 齒科新報社 (齒科新報社, 1914-11) 矢來夜語
経済時報. (12 月號) (144) (経済時報社, 1914-12)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齒科新報. 7(12) 齒科新報社 (齒科新報社, 1914-12) 矢來夜話

1915 年

- 経済時報. (1 月號) (145) (経済時報社, 1915-01) 客に内外政局の近事を語る / 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1 月號) (145) (経済時報社, 1915-01) 日本民族發展の史的觀察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2 月號) (146) (経済時報社, 1915-02) 賀状のさま / 曉峰生

大日本, 1915年2月(大日本社) **近時の政局と犬養木堂**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5年2月(大日本社) **時代と新聞及雑誌** / 矢來臺人
 大日本, 1915年2月(大日本社) **女学生及女学校** / 劍書楼
 経済時報, (3月號)(147)(経済時報社, 1915-03) **發展日本新論** / 滿川龜太郎
 大日本, 1915年3月(大日本社) **噴火山上の袁大總統**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5年3月(大日本社) **女学生及女学校** / 劍書楼
 経済時報, (4月號)(148)(経済時報社, 1915-04)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5月號)(149)(経済時報社, 1915-05) **民國の近情と袁大總統**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5年4月(大日本社) **女学生及女学校** / 劍書楼
 大日本, 1915年6月(大日本社) **当世人物詮議(国民新聞と徳富猪一郎君)** / 矢來臺人
 経済時報, (5月號)(149)(経済時報社, 1915-05)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6月號)(150)(経済時報社, 1915-06)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歯科新報, 8(6)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5-06) **矢來夜話(四)**
 大日本, 1915年6月(大日本社) **ワーテルローの追想**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5年6月(大日本社) **忙中閑** / 南溟庵主人
 歯科新報, 8(7)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5-07) **矢來夜話(五)**
 大日本, 1915年7月(大日本社) **当世人物詮議(東京毎夕新聞と床次竹次郎君)** / 矢來臺人
 経済時報, (7月號)(151)(経済時報社, 1915-07)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8月號)(152)(経済時報社, 1915-08) **矢來台より**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9月號)(153)(経済時報社, 1915-09)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5年9月(大日本社) **当世人物詮議(世界の変局と石井新外相)** / 矢來臺人
 歯科新報, 8(9)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5-09) **矢來夜話**
 歯科新報, 8(10)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5-10) **矢來夜話** / 曉峰生
 大日本, 1915年10月(大日本社) **当世人物詮議(政友会総裁原敬君)** / 矢來臺人
 大日本, 1915年10月(大日本社) **帝国陸軍の中堅人物** / 南溟庵主人
 歯科新報, 8(11)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5-11) **矢來夜話(八)**

1916年

歯科新報, 9(1) 歯科新報社(歯科新報社, 1916-01) **矢來夜話**
 経済時報, (1月號)(156)(経済時報社, 1916-01)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6年2月(大日本社) **支那動乱の大勢**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6年2月(大日本社) **半製皇帝袁世凱君** / 矢來臺人
 経済時報, (3月號)(158)(経済時報社, 1916-03) **矢來閒談** / 曉峰生
 経済時報, (3月號)(158)(経済時報社, 1916-03) **支那鐵火の洗禮**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6年3月(大日本社) **支那悲観乎楽観乎** / 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5月號)(160)(経済時報社, 1916-05) **十燭燈下** / 曉峰生
 大日本, 1916年5月(大日本社) **墮落文学退治** / 劍書楼
 経済時報, (7月號)(162)(経済時報社, 1916-07) **矢來臺より**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6年8月(大日本社) **新協約と国際関係** / 猶存楼客
 大日本, 1916年8月(大日本社) **先づ文部の無経綸を責めよ** / 猶存楼客
 大日本, 1916年8月(大日本社) **墮落文学退治** / 劍書楼
 大日本, 1916年9月(大日本社) **社説 海外に暴露さるる邦人の弱点**
 大日本, 1916年9月(大日本社) **墮落文学退治** / 劍書楼
 大日本, 1916年10月(大日本社) **墮落文学退治** / 劍書楼

経済時報. (10月號)(165) (経済時報社, 1916-10) 在外邦人の缺陷 / 南溟庵主人

1917年

経済時報. (1月號)(168) (経済時報社, 1917-01) 自主的日本國民論/南溟庵主人
経済時報. (2月號)(169) (経済時報社, 1917-02) 矢來臺より/曉峰生
経済時報. (3月號)(170) (経済時報社, 1917-03) 春宵漫思錄/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7年3月(大日本社) 提携の意義自ら瞭か也/猶存楼客
経済時報. (4月號)(171) (経済時報社, 1917-04) 矢來臺より/曉峰生
経済時報. (4月號)(171) (経済時報社, 1917-04) バグダツド鐵道の研究/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7年5月(大日本社) 汎獨逸主義/猶存楼客
経済時報. (6月號)(173) (経済時報社, 1917-06) 全獨逸主義の研究(上)/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7年6月(大日本社) 欧州に於ける悪文学取締/劍書楼
大日本. 1917年6月(大日本社) 「獺」の暗示する新海軍計画/猶存楼客
経済時報. (7月號)(174) (経済時報社, 1917-07) 全獨逸主義の研究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7年7月(大日本社) 社説 支那の凶兆と帝国の準備
大日本. 1917年7月(大日本社) 国防的結論としての亜細亞主義/猶存楼客
経済時報. (8月號)(175) (経済時報社, 1917-08) 急務閑談/曉峰生
大日本. 1917年8月(大日本社) 日支興廢の機と我積極政策/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8月號)(175) (経済時報社, 1917-08) 日本の地位と亞細亞問題/某亞細亞人;南溟庵主人
我が国(1917年8月). 印度の不穩と其将来/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9月號)(176) (経済時報社, 1917-09) 落田君——(文藝) / 曉峰生
大日本. 1917年9月(大日本社) 印度問題の帰航 / 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11月號)(178) (経済時報社, 1917-11) 矢來臺より / 曉峰生
経済時報. (11月號)(178) (経済時報社, 1917-11) 回顧の時代 / 滿川龜太郎
亜細亞時論, 第1卷第5号, 黒童会, 1917年11月 時論 國際政局の新中心 中亞と印度とに着眼せよ/滿川龜太郎

1918年

経済時報. 18(2月號)(181) (経済時報社, 1918-02) 矢來臺より/曉峰生
亜細亞時論, 第2卷第2号, 黒童会, 1918年2月 時論 波斯灣の復古的形勢/滿川龜太郎
大日本. 1918年2月(大日本社) 亜細亞海岸鐵道 / 滿川龜太郎
亜細亞時論, 第2卷第3号, 黒童会, 1918年3月 時論 国防線の推移と南方亜細亞 / 滿川龜太郎
大日本. 1918年3月(大日本社) 亜細亞に於ける英獨争覇戦 / 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18(5月號)(184) (経済時報社, 1918-05) 世界の棉花に就て / 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8年5月(大日本社) 印度の西北境上 / 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18(6月號)(185) (経済時報社, 1918-06) 世界の紡績に就て / 南溟庵主人
亜細亞時論, 第2卷第6号, 黒童会, 1918年6月 時論 亜細亞の西門 / 滿川龜太郎
経済時報. 19(7月號)(186) (経済時報社, 1918-07) 矢來臺より / 曉峰生
亜細亞時論, 第2卷第7号, 黒童会, 1918年7月 時論 南方亜細亞の一角/滿川龜太郎
大日本. 1918年9月(大日本社) 社説 占領南洋諸島を改称すべし
経済時報. 18(9月號)(188) (経済時報社, 1918-09) 列強の經濟的大勢/滿川曉峯
大日本. 1918年9月(大日本社) 阿弗利加縦貫鐵道/滿川龜太郎

大日本, 1918年10月(大日本社) **米穀国営、土地国有**/猶存楼客
経済時報, 18(10月號)(189)(経済時報社, 1918-10) **大戦四年に際して自ら曩日の預言を嘖ふ**/満川曉峯
亜細亜時論, 第2巻第10号, 黒竜会, 1918年10月 **時論 波斯の対露条約破棄**/満川亀太郎
経済時報, 18(11月號)(190)(経済時報社, 1918-11) **西伯利鐵道沿線都會**/南溟庵主人
大日本, 1918年12月(大日本社) **社説 講和来と亜細亜の運命**
経済時報, 18(12月號)(191)(経済時報社, 1918-12) **歳暮漫感**/曉峰生
経済時報, 18(12月號)(191)(経済時報社, 1918-12) **西伯利鐵道沿線の都會**/南溟庵主人

1919年

経済時報, 19(1月號)(192)(経済時報社, 1919-01) **南米の危機**/満川曉峯
大日本, 1919年1月(大日本社) **秘智国際關係**/満川亀太郎
亜細亜時論, 第3巻第1号, 黒竜会, 1919年1月 **時論 我國民の馴化性と亜細亜開発の使命**/満川亀太郎
亜細亜時論, 第3巻第2号, 黒竜会, 1919年2月 **雜纂 大作氏の追懷**/満川亀太郎
東方時論, 4(2)(東方時論社, 1919-02) **亜細亞南半の大勢**/満川亀太郎
経済時報, 19(2月號)(193)(経済時報社, 1919-02) **講和會議の花形ロイド・ジョージ**/劔書楼主人
亜細亜時論, 第3巻第4号, 黒竜会, 1919年4月 **時論 英領たらんとする亜刺比亞**/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4月(大日本社) **社説 朝鮮問題の再査**
大日本, 1919年4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5月(大日本社) **埃及国民運動**/満川亀太郎
経済時報, 19(5月號)(196)(経済時報社, 1919-05) **列強海外投資策の研究**/南溟庵主人
国家社会主義, 第2号, 1919年6月 **脈々の熱血**/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6月(大日本社) **猶太民族運動の成功**/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6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7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8月(大日本社) **所謂精神教育**/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8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亜細亜時論, 第3巻第7号, 黒竜会, 1919年9月 **雜纂 阿弗利加に於ける亜細亜族の動搖**/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9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亜細亜時論, 第3巻第8号, 黒竜会, 1919年10月 **亜細亜解放運動**/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10月(大日本社) **社説 亜細亜の大勢**
大日本, 1919年10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大日本, 1919年11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一周年の記**/満川生
大日本, 1919年11月(大日本社) **老社会の記**/満川亀太郎

1919年以后

東洋, 4月號(東洋協會, 1927-04) **戴氏來朝を機として**/南溟庵主人

致谢

去年十月开始构思，十一月确定选题，十二月着手文献阅读，一整个寒假的文本史料梳理，三周的初稿执笔，一个半月的修改翻新，最终到今天完成终稿……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浓缩了我最近一年的生活，也映透着我整个大学四年的光影。

我首先要向在我求学之路中指点过我的所有老师献上诚挚的感谢与敬意。于铁军老师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循循善诱、儒雅睿智，在论文的选题阶段给予了我十足的启发，又在论文的执笔过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于老师每月一次的交流保证了我的毕业研究能踏实顺利地推进。我研究生阶段的未来导师唐利国老师犀利地指出了本文初稿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上的缺陷，敦促着我的思考脱离原有的幼稚。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导师 Sterenberg 先生引导我走进了思想史和智识史的大门，并教会了我许多论文写作的技巧。东北大学的朱琳老师在本文的选题阶段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李寒梅老师对于初稿的修改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由于我学力尚浅，本文的观点与论证最终仍不免粗糙稚嫩，在未来数年，我必须潜心继续向各位师长求取学识、经验与智慧。

日本早稻田大学在读的张浩东、Yolanda 同学和董聪利师姐为本文提供了构成血肉的大部分文献资料，他们在东京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冒着疫情风险前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替我复制一手史料，没有他们的热情协助与倾力付出，本文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对他们的贡献怀有无以复加的感激，并期待着能在未来有所回报。

求学升学的路途上布满了乌云与风浪，如果没有身边友伴的提携与帮助，或许我无法面对并克服过去一年中的种种挑战。程潇雨、陆叶和邵卓然倾听了我无止境的抱怨和诉苦，让我在最难熬的那几个月仍能获得宽慰与欢乐。徐澳、方锦仪和杨洁对我长久的无条件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的焦虑不安。依多和肖和两位师弟妹比我自己更严肃理性地思考我的未来前途，激励着我奋勇迈进。张吕弘扬学姐展示的真挚与善意使我深受感动。

回首一路至此的四年，无数的人物与片段在我眼前浮现。曾与我共同经营院团委宣传部的陈佳和王诗语两位伙伴陪伴我度过了充实而精彩的一年学工生活。霍宸霄、徐天赐和侯钦三位室友为我创造了和睦安静的生活环境。杨晶晶学长在我刚入校时便与我相识，四年间在学业、研究和生活上都不断提携着我。王羽端、王子怡、张博闻、谷家桢、周心语和喻言等同在北大的高中校友给予了我一个温暖而有凝聚力的大后方，并以他们在各方面的活跃与优秀鞭策着我不敢怠惰……还有其他所有曾陪伴帮扶我的朋友和先辈，你们共同构筑了独属于我的大学生活。

虽说已是故人，我仍想透过泛黄的纸页向我的两篇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夏目漱石与满川龟太郎——致以忠实的敬意。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疏隔愈甚的时代，能通过文本跨越时空阻隔，潜入他们思考的深处，触摸他们的关切与悲喜，与作为人类而非冰冷历史事实的他们建立起精神及情感联系，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体验。漱石先生在作品、日记与书信中毫无保留的坦诚唤起了我全方位的共鸣，他所怀抱的疑问和不安也使我逐渐开始悦纳自己的“怪异”与困惑。满川君在某种意义上同漱石先生和我属于完全相反类型的人，虽然其所思所行客观上加速了近代日本的军国化，但他在时评论文与随笔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积极心态和坚定的现实理性（以及对我这般“软派青年”的辛辣批判）也刺激了我重新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更加平实的目光看待世界。

我还必须向身在家乡却无时不牵挂着我的父母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包容并认可我的思考与选择，无条件地在经济和情感上支持我。如果说我在学生时代获得了何种成绩，或是在将来可能取得些许成就，没有父母为我默默坚实地付出，这些都永远只是空中楼阁。

最后，尽管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此处还有最后一位致谢对象——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此时正坐在电脑前的我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刚开始时，我尚不知自己能去向何方，也没有自信能顺利完成一篇有所进益的毕业论文。去年秋天的彻底反思后，一年中我无数次地向自己重复“make the best out of the worst”这句话，并在师长和亲友的鼓励下，付之于果敢的尝试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如今终于收获了令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这并不是自夸，而是我对自己终于能给出的肯定。未来的求学与事业之路并不必然充满希望，但我相信，相比于一年前的自己，我能以更加稳健的步伐开启下一段旅程。

再次谢谢各位师长、前辈、朋友和亲人！

汪国彰

2021年5月23日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汪国彰

日期：2021年6月6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汪国彰 导师签名：于铁军

日期：2021年6月7日